

日治時期臺灣「雙語學歷菁英世代」 及其政治實踐： 以草屯洪姓一族為例*

陳文松**

摘要

日本統治之初，殖民政府除藉由軍事討伐以鎮壓各地武裝抗日分子外，為了落實和推行殖民政策，一方面籠絡鄉紳階層出錢出力，協助殖民統治；一方面則積極設立新式學校，招募鄉紳階層的年輕子弟就讀，以培養殖民統治所需的近代化人才——「雙語學歷菁英」。而以草屯地域來看，這批雙語學歷菁英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殖民統治中，不論是對殖民地政府或地域社會，都扮演著重要且發揮相當作用的角色。

本文是以草屯地域與抗日運動領導者之一的洪元煌同屬洪姓一族的三位雙語學歷菁英——洪清江（1881-1964）、洪深坑（1897-1941）和吳萬成（1902-?）為例，具體論述三人自國語學校畢業後，一直到殖民統治體制崩壞前，在殖民政府的政策推動與地域社會臺灣人自治傳統維繫之間，如何從事政治實踐的歷程。

從結果來看，原任公學校訓導的三人，在日本統治時期，參與殖民政治的程度卻深淺不同。洪清江因職務關係（區長後出任助役）介入最深，洪深坑（官製青年團運動）其次，吳萬成則不僅涉入最淺（僅曾任公學校訓導），且對殖民統治

* 本文曾分別以〈植民地台湾における地域社会の台湾人青年教師の役割：草屯地域の洪氏一族を事例にして〉和〈日治時期臺灣社會「跨語學歷菁英世代」及其政治實踐：以洪元煌的乘龍快婿兼左右手吳萬成為例〉為題，發表於日本大阪經濟大學日本經濟史研究所第 61 回經濟史研究會「近代における日本と台湾」（2010 年 12 月 11 日），以及京都「同志社大学 D O S C + 国立成功大学共同ワークショップ」（2011 年 6 月 4-5 日），會中先後承蒙評論人大阪經濟大學經濟學部教授近藤直美與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術院國際政治經濟學科教授若林正文，以及與會人士提供寶貴意見，謹此致謝。其次，感謝匿名審查人提出的建議與修正意見，讓本文內容更加充實完整。本文為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殖民統治與『青年』：臺灣總督府的『青年』教化政策與地域社會的變遷」（NSC98-2410-H-259-045-MY2）成果之一，特此一併致意。

**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來稿日期：2011 年 2 月 14 日；通過刊登：2011 年 7 月 27 日。

體制批判最厲。由此可以看出，雙語學歷菁英的政治參與和政治實踐，呈現出多元多重的樣貌。

關鍵字：雙語學歷菁英、洪元煌、洪清江、洪深坑、吳萬成、草屯、國語學校

- 一、前言
 - 二、殖民政策推動的得力助手：洪清江（1881-1964）
 - 三、地域社會青年教化的指導者：洪深坑（1897-1941）
 - 四、洪元煌的乘龍快婿兼左右手：吳萬成（1902-?）
 - 五、結論：雙語學歷菁英殖民政治參與的多元樣貌
-

一、前言

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與醫學校培養出來的新一代知識菁英，與 1920 年代抗日運動的關係，以及師範教育所培育出的新社會領導階層，其與舊世代的異同，都已有深厚且經典性的研究成果。¹ 宮崎聖子的研究則延續蔡慧玉與吳文星等人對街庄層級之地方菁英和地方制度的討論，更具體指出青年團制度在地域社會中所扮演的多重角色，尤其是官製青年團的指導者大多出自國語學校畢業的臺灣人教師。² 而臺灣人醫師與殖民統治的關係性，則有駱明正的深入分析。³ 但綜觀以上所述，有關國語學校以及教師這項近代職業與殖民統治的關聯性，尤其是地域社會中，國語學校內、臺人教師所扮演的角色，仍有待進一步探討。

換言之，國語學校畢業生有一部分是活躍於 1920 年代非武裝抗日運動中的全島性菁英，如蔡培火、黃呈聰、陳逢源、林呈祿與黃旺成等人；⁴ 有一部分成

¹ 若林正文，《台灣抗日運動史研究》（東京：研文出版，2001）；周婉窈，《日據時代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臺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89）；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臺北：正中書局，1992）等。

² 宮崎聖子，《植民地期台湾における青年団と地域の変容》（東京：御茶の水書房，2008）；陳文松，〈評介宮崎聖子著《植民地期台湾における青年団と地域の変容》〉，《臺灣史研究》17: 2（2010年6月），頁247。

³ Ming-cheng Miriam Lo, *Doctors within Borders: Profession, Ethnicity, and Modernity in Colonial Taiwan*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⁴ 在史料上，最早有林呈祿、陳旺成、陳逢源三位的口述訪談紀錄（黃富三、陳俐甫編，《近現代臺灣口述歷史》〔臺北：林本源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1991〕），而蔡培火等人亦有全集（蔡培火著、張漢裕主編，《蔡培火全集》〔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00〕）；但這些仍

為總督府協力體制中的全島性菁英，其中又以劉克明、魏清德等最受矚目。⁵除了上述兩者之外，有更多不為人知的地方性菁英，其知名度雖不如上述兩者，卻是一股地域社會不可忽視的能量，且呈現的面貌更為多元。因此，本文的目的，便在於探討這批在地域社會擔任教師一職的「雙語學歷菁英」臺灣人，在殖民統治體制下涉入殖民政治的深淺程度，進一步描繪殖民統治下政治實踐的多元樣貌。其中，有關國語學校內地人畢業生在地域社會扮演的角色，弘谷多喜夫雖曾有專文論述，⁶但並未進行細部的討論及個案的研究。因此，本文將於相關之處一併討論地域社會中國語學校內地人畢業生的角色，藉以呈現殖民統治下內、臺人⁷——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相關性。

有關本文在分析概念上所使用的「雙語學歷菁英」一詞，先說明如下。戰後時人在回憶日治時期抗日運動人物時，曾稱跨日治時期到戰後初期的臺灣人知識菁英為「跨越語言一代」。⁸本文援用此一概念，並援引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 1936-)在其名著《想像的共同體》中，針對西方帝國統治下，印尼社會「殖民地青年」所具有的「雙重語言讀寫能力」概念，相互參照融合，⁹而將

偏重全島性菁英的殖民地經驗談。而其中陳旺成(即黃旺成)日記的問世，尤其任職公學校期間的日記已全部出版，對於公學校訓導一職的實證研究，將可望有重大的發展(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一~七)》[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8-2010])。而本文將在以上的研究成果及史料基礎上，針對上述與黃旺成具有同樣背景，卻活躍於不同地域的臺灣人青年教師的政治參加樣態加以考察，藉此探討除了知名的全島性菁英之外，究竟在地域社會當中，臺灣人教師與殖民統治之間，又呈現出何等樣態。

⁵ 陳文松，〈臺灣近代學閥形成之原形：以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同窗會為中心〉，收於若林正文、松永正義、薛化元主編，《跨域青年學者臺灣史研究論集》(臺北：稻鄉出版社，2008)，頁103-136。

⁶ 弘谷多喜夫，〈植民地教育と日本人教師〉，收於「講座日本教育史」編集委員会編，《講座日本教育史》(東京：第一法規出版，1984)，第3卷，頁361-381。

⁷ 本文所稱內地人專指日本人；臺灣人當時稱本島人，乃專指漢民族為主的臺灣人但不包含臺灣原住民。

⁸ 此一用語出自詩人林亨泰，後經洪銘水加以詮釋「泛指歷經兩種語文環境的一代作家」。(洪銘水，〈《少奇吟草》跨越世代的見證〉，收於葉榮鐘著，葉芸芸、陳昭瑛主編，《少奇吟草》[臺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01]，頁39-72，以及註14。)而在林莊生書中，則有更深入的描述，且更往前追溯與其父同世代的朋友，指出「他們都是出生在日本領臺(1895)以後，所受的正規學校教育是日本的。……這種人多半是少年時期受過漢文教育。」(參見林莊生，《懷樹又懷人：我的父親莊垂勝、他的朋友及那個時代》[臺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2]，頁238。)換言之，不論是由日文轉換為中文(二次大戰前後)，或從漢文轉換為日文(甲午戰爭前後)，長達半個世紀的日治時期「正規學校教育」，對於臺灣人語言情境的使用和轉換，扮演著最具關鍵性地位的形塑角色，而筆者所討論的對象不以林莊生所言出生1895年以後為限。

⁹ ベネディクト・アンダーソン著，白石さや、白石隆訳，《想像の共同体：ナショナルリズムの起源と流行》(東京：NTT出版，1997)，頁191-192。中譯本請參照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

日治時期受過傳統漢文教育並取得公學校畢業（含）以上新式學校教育之學歷，而有「雙重語言〔按：日文與漢文〕¹⁰ 讀寫能力」的臺灣「殖民地青年」，統稱「雙語學歷菁英世代」，或簡稱「雙語世代」。至於所謂政治實踐或政治參與，目前的研究成果多半以臺灣人是否進入日本帝國或殖民地官僚體制為基準，並將抗日為主體的反殖民運動視為一種「政治」運動。然而，殖民統治體制下的「政治」不應作如此狹義的解釋。¹¹ 對於被統治者而言，殖民統治的相關機制幾乎無所不在，從高度政治性的揚文會¹² 到詩社的設立，¹³ 或日常生活的「空間」¹⁴ 和「時間」，¹⁵ 都可以說是另一種廣義的「政治」參與或實踐。基於此，進入殖民地學校就讀，本身便是一種「政治」參與，¹⁶ 更何況是擔任臺灣人教師一職，¹⁷ 不但在體制上已成為殖民地官僚體制的一環，在職業之外的所作所為，更應視為具有能動性的政治施為。故不管是參與抗日政治運動，或協助殖民統治等，這些程度或許深淺不一，但仍是一種「政治」參與和實踐。

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10），頁170。

¹⁰ 有關殖民地臺灣「漢文」發展之歷史脈絡及其複雜性，請參考陳培豐詳細之論考。陳培豐，〈日治時期臺灣漢文脈的漂游與想像：帝國漢文、殖民地漢文、中國白話文、臺灣話文〉，《臺灣史研究》15:4（2008年12月），頁31-86。

¹¹ 對此，岡本真希子早已指出殖民地與殖民地母國的不同：「臺灣與朝鮮等處在殖民地統治體制下的人們，並未被賦與國政參政權，在地方自治體層級上的政治參與的範圍也有相當大的限制。處在殖民地統治這種非常不利的政治狀況下的人們，在追求一種政治自由時，其運動必然會經過一個與殖民地政權或殖民地本國的對抗與妥協的政治過程。」岡本真希子，〈殖民地統治下臺灣的政治經驗〉，收於若林正文、吳密察主編，《跨界的臺灣史研究：與東亞史的交錯》（臺北：播種者文化有限公司，2004），頁172。而岡本真希子有關殖民地官僚研究的最新成果，請參照岡本真希子，《殖民地官僚的政治史：朝鮮、台灣總督府と帝国日本》（東京：三元社，2008）。

¹² 楊永彬，〈日本領臺初期日臺官紳詩文倡和〉，收於若林正文、吳密察編，《臺灣重層近代化論文集》（臺北：播種者文化有限公司，2000），頁105-181。

¹³ 黃美娥，《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臺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

¹⁴ 顏杏如，〈殖民地都市台北における日本人の生活文化：「空間」と「時間」における移植、変容〉（東京：東京大学総合文化研究科地域文化研究専攻博士論文，2009）。

¹⁵ 呂紹理，《水螺響起：日據時期臺灣社會的生活作息》（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

¹⁶ 洪元煌就讀公學校便是一種「示範性」的展演。陳文松，〈從傳統士人到「近代青年」的文化交錯與轉換：「不倒翁」洪元煌與草屯碧山吟社〉，《臺灣古典文學研究集刊》1（2009年6月），頁289-343。

¹⁷ 臺灣人教師又稱「訓導」，比照判任官待遇，即低階普通文官；內地人教師則稱教諭，可兼校長，有指揮訓導之權。「臺灣公學校官制」，收於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臺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1995），頁224-2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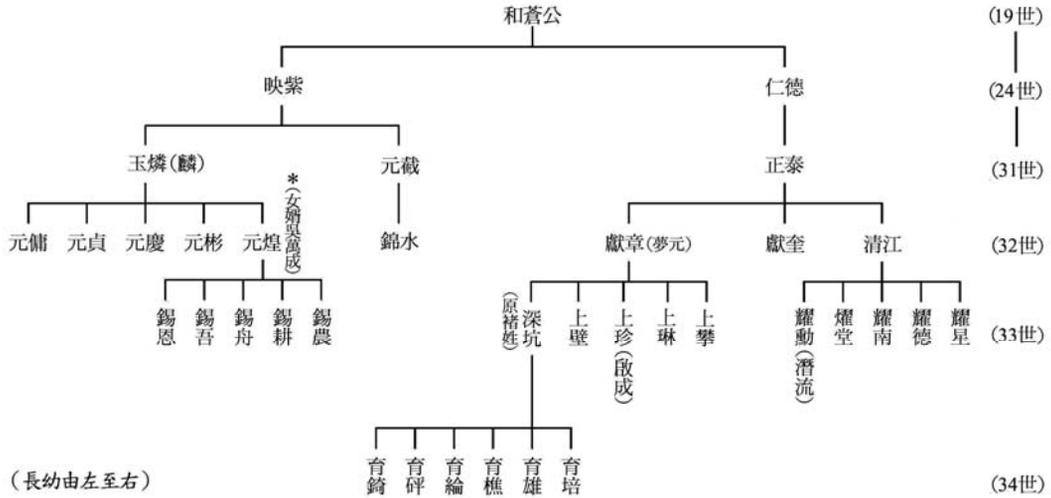
筆者曾利用 1999 年 9 月 21 日臺灣中部大地震後，新出土的個人詩集等相關史料，分析 1920 年代活躍全臺的抗日運動領導人物之一的洪元煌，有關其在日治時期堅持臺灣人自治的思想與晚年心境的變化，¹⁸ 以及青年時期創設「碧山吟社」連結草屯年輕世代，與中部文人抒發對殖民統治的「新仇舊恨」。¹⁹ 但在這兩篇討論中，對於支持並協助其「政治」行動的重要參與者，特別是洪姓一族的主要支持者未及深論。由於這些重要參與者不但如洪元煌般，受過地域社會的傳統書房或漢文教育，更是得到殖民地近代教育的青年，尤其洪姓一族有多人於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畢業後擔任公學校教師，具有「新領土經營者」²⁰ 的政策代理人身分，其角色扮演更令人玩味。尤其在地域社會中，當他們處在洪元煌所領導的抗日（臺灣人自治）運動與遂行殖民地教育、教化政策之間，究竟如何取捨和自處，更值得深論。

具體而言，本文將以洪清江（1881-1964）、²¹ 洪深坑（1897-1941）與吳萬成（1902-?）三位人物，作為論述分析和比較的對象。主要理由乃基於以下幾個特點：首先，三者都是國語學校畢業，是具有「雙重語言讀寫能力」的「殖民地青年」，屬於本文所稱的「雙語學歷菁英世代」；其次，三者在國語學校畢業後，皆曾先後擔任臺灣人教師（訓導）一職，符合殖民地政治參與的要件。但三者參與的層面和程度深淺不同，其中吳萬成更毅然辭去教師一職，投身與殖民政府針鋒相對的抗日運動。由此顯見，政治參與並非只是加入殖民統治體制，脫離體制更

¹⁸ 陳文松，〈洪元煌の抗日思想：ある「台湾青年」の活動と漢詩〉，《日本台湾学会報》9（2007 年 5 月），頁 67-92。另，關於草屯地域開發史的相關研究有：曾敏怡，〈草屯地區清代漢人社會的建立與發展〉（臺中：東海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1998）；張家綸，〈草屯社會發展與地方菁英（1751-1945）〉（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8）等。而針對洪姓一族的研究成果，則可參見：石田浩，〈台湾中部における漢人村落の展開過程とその社会構造：南投県草屯鎮加老里の洪同族の調査事例〉，收於氏著，〈台湾漢人村落の社会経済構造〉（大阪：関西大学出版部，1985），頁 91-140；駒込武，〈抗日運動における教育要求と総督府の教育政策：1920-1930 年代台中州草屯庄の事例を中心に〉，收於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編，〈日據時期臺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該系，1993），頁 415-442 等。

¹⁹ 陳文松，〈從傳統士人到「近代青年」的文化交錯與轉換：「不倒翁」洪元煌與草屯碧山吟社〉，頁 289-344。
²⁰ 町田則文，〈會員に告ぐ〉，《校友會雜誌》1（1899 年 2 月），頁 1。

²¹ 「其畢生致力教育，不分男女親疏遠近，皆勉人力學。」（洪敏麟總編輯，〈草屯鎮誌〉〔南投：草屯鎮誌編纂委員會，1986〕，頁 934-935。）據此，洪清江的出生年份為 1882 年，本文則依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學籍簿與《臺灣人士鑑》所記明治 14 年（1881）為準。（臺灣新民報社調查部編，〈臺灣人士鑑〉〔臺北：臺灣新民報社，1934〕，頁 67-68。）



圖一 洪氏族譜簡表（以與本研究相關的人物為主）

資料來源：洪敏麟總編輯、許錫專等編，《洪氏族譜》（南投：重修洪氏族譜編輯委員會，1994），頁 110-111、126-127。

是從事體制外政治實踐的「政治性宣示」；第三，三者皆屬草屯地域洪姓一族，不過除了洪清江與洪元煌有同宗血緣關係外，洪深坑和吳萬成則是透過婚姻關係成為洪姓一族的成員（參見圖一）。由此可看出藉由國語學校取得高學歷的臺灣人（不分男女）之間，通婚儼然成為社會流動的另一種管道，同時也顯示新式學歷受到傳統大家族的青睞。²² 更重要的是，這三位先後來自不同地域的雙語學歷菁英，1920年代皆集結於洪元煌旗下，不同程度地參與了臺灣文化協會所掀起的一連串抗日運動。然而，也因為三者與殖民統治體制之間不同程度的政治參與，因此可讓後人得以檢視這類菁英是如何面對與拿捏參與「政治性」運動，與遂行殖民政策間的態度與分寸。

就結論來看，洪清江因職務關係介入最深，洪深坑其次，吳萬成則不僅涉入最淺，且對殖民統治體制批判最厲（詳後述與附表一）。但批判最厲者，未必能

²² 洪郁如，《近代台灣女性史：日本の植民統治と「新女性」の誕生》（東京：勁草書房，2001），頁 231-238。

脫離殖民統治之網，吳萬成即因此淪為「高等遊民」²³ 而遠赴中土。涉入愈深者，卻也常陷於兩面為難之境，尤其長期寄身殖民體制的洪清江和洪深坑，夾在洪元煌所領導的「政治性」運動，與君臨草屯地域貫徹殖民政策的統治者渥美寬藏²⁴ 之間，如同身陷夾縫，各自扮演著吃力不討好、既矛盾又揉合的角色。

二、殖民政策推動的得力助手： 洪清江（1881-1964）

殖民統治初期以北投堡總理洪玉麟²⁵ 為首的草屯地域鄉紳階層，在面對統治者時，一方面致力於維繫傳統書房教育，一方面出錢出力，與國語學校內地人校友共同創建公學校，以推進殖民地近代教育。除了創校經費之外，他們還必須「捐輸」自己的子弟，如草屯地域第一位公學校畢業生洪元煌，正是洪玉麟之子。²⁶ 因此，自 1899 年草鞋墩分教場（日後的草屯公學校）創設以來，畢業生人數雖逐年增加，但其中四大姓（洪、李、林、簡四姓氏）的子弟，尤其出自於洪姓和李姓的子弟，仍占絕大部分。²⁷ 而且，為了培養出符合統治需求的新式人才，除了基礎的公學校教育之外，統治者更進一步將各地的優秀學生送往島都臺北的國語學校，使其成為推動學校教育、社會教化與殖民政策的新領土經營者。而草屯地域中，扮演領頭羊角色者，便是洪清江。

²³ 「高等遊民有別於流浪漢或無家可歸的遊民，泛指受過高等教育卻找不到固定工作的人，這句話在明治 40 年代起經常被使用。」後來因這些人往往易受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等「危險」思想的影響，而成為社會一大隱憂。（參見竹內洋，《立身出世主義：近代日本のロマンと欲望》（京都：世界思想社，2005），頁 102）而高等教育幾乎完全不存在的臺灣，國語學校等中等教育機關以上畢業的臺灣人，1920 年代臺灣人意識覺醒之後，便經常被殖民政府視為「高等遊民」，受到高度警戒與打壓。

²⁴ 日本宮城縣人，國語學校內地人畢業生，曾長期擔任草鞋墩公學校首屆校長，之後歷任草屯庄長、街長等職。「日據時期為草鞋墩公學校首任校長，洪元煌、洪火煉、李烏棕暨其他地方名士，均為受業弟子。」參見洪敏麟總編輯，《草屯鎮誌》，頁 943。

²⁵ 1831-1914 年，北投堡番仔田（今草屯鎮新豐里）人，家世為總理。乙未之役，出任「保良局長」，綏撫人心，地方賴以安寧。1899 年，洪玉麟與諸紳集資興建草鞋墩公學校校舍，以利子弟。洪元煌即洪玉麟之五男。參見洪敏麟總編輯，《草屯鎮誌》，頁 932-933。

²⁶ 參見陳文松，〈從傳統士人到「近代青年」的文化交錯與轉換：「不倒翁」洪元煌與草屯碧山吟社〉，頁 318-319。

²⁷ 草屯國民小學，《創立七十週年紀念同學錄》（南投：草屯鎮草屯國民小學，1970），頁 3。

如上所述，草鞋墩公學校第一屆畢業生只有洪玉麟之子洪元煌一人，但自第二屆以後，洪姓出身的畢業生逐年增加，其中，文秀才洪獻章²⁸的弟弟洪清江，因在第二屆的6名學生中成績特別優異，便經由公學校推薦，越級就讀國語學校師範部走上教師之路。²⁹洪清江在國語學校畢業之後，長年服務於母校，並與首任草鞋墩公學校校長渥美寬藏共同推動校務。1920年，渥美寬藏升任首屆臺灣地方制度改正後的草屯庄長時，洪清江受其青睞，被任命為助役，協助街庄行政事務的推動。

有關洪清江戰前的主要經歷，在此根據1934年《臺灣人士鑑》的記載，簡述如下：

〔按：洪清江，以下同〕明治14年5月19日出生於現址（即番子田），為洪正泰氏的四男。明治39年3月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乙科畢業後至大正4年為止約十年間，先後在皮子寮、草屯各校擔任公學校訓導一職，專心致力於教化工作。大正4年9月被任命為新庄區長，大正9年地方制度改正之同時被任命為草屯庄助役迄今。大正9年6月14日，依據臺灣紳章條例頒授紳章。³⁰

其兄洪獻章亦獲頒紳章，兄弟兩人先後成為殖民政府頒授紳章的受贈者，但前者為傳統科舉出身的文秀才（「舊士」），後者則是接受近代新式高等教育的新青年（「新士」）；這種新、舊「士」同時交錯在臺灣社會的景象，正彰顯出傳統漢人科舉致仕的「履歷」內涵，如何在殖民政府推動的新式學校教育體系中，重新詮釋與轉換成近代學歷的過程。

1906年3月，洪清江畢業於國語學校師範部乙科，成為該校校友會的終身會員，而任職母校期間，日後成為草屯下一世代代表性人物之一的張深切（後成為知名的社會運動家和文學家），亦曾在1912年左右上過他的課。³¹

²⁸ 1873-1928年，北投堡番子田人，清末文秀才。「為人忠厚溫雅，志操高節，日據初舉保正，惟以保正為己任，閒居讀書自娛，人若謀以救荒恤貧等地方公益，輒不吝輸財。」詳見洪敏麟總編輯，《草屯鎮誌》，頁934。

²⁹ 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學籍簿中，亦銘記洪清江在草鞋墩公學校只念五年。參見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藏，〈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學籍簿〉。

³⁰ 臺灣新民報社調查部編，《臺灣人士鑑》，頁67-68。

³¹ 張深切著、陳芳明等編，《張深切全集》（臺北：文經出版社有限公司，1998），卷1：里程碑，頁89。

1915年9月，洪清江繼洪玉麟（清末武秀才）和洪聯魁（清末文秀才）³²之後，被殖民政府選任為新庄區長。在區長仍普遍由舊鄉紳階層選任的當時，這位1881年出生、年僅34歲的年輕區長所以受到殖民政府青睞，除了出身洪姓一族的原因外，國語學校出身這項學歷，無疑也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

區長上任不久，洪清江便引領草屯地域住民，推動所謂改過陽曆新年的運動。1915年底，洪清江與區內有力人士共同呼籲大家一起改過陽曆新年，而非傳統漢人社會的農曆新年。³³當年正值日本領臺20週年的關頭，所以雖然只是草屯地域內一個小小區長的舉動，仍引起當時臺灣唯一的全島性新聞，同時也是殖民政府喉舌的《臺灣日日新報》矚目。該報的報導如下：

南投廳草鞋墩支廳新庄區長洪清江氏（國校師範部卒業生）。暨同庄埤圳主事洪元煌氏。有力家洪錦水氏。皆當地新進有為。熱心公益之人也。頃為地方改良計。發起改奉正朔。即廢陰曆新正。迎陽曆新正。此事一傳。庄民欣然贊成。³⁴

從這篇報導，可見當時草屯地域的「新進有為」青年所處的政治狀況。報導中所言「此事一傳。庄民欣然贊成」，著實有令人質疑的餘地，而更令人注意的地方，至少有三點可以進一步討論：

首先，對於發起人洪清江，報導中特別加註其「國校（即國語學校）師範部卒業生」的學歷，由此可看出國語學校畢業這項「學歷」在當時的稀有性，藉此向讀者暗示他們是具有雙語讀寫能力並擔負教化新附民（即臺灣人）使命的新領土經營者。而且實際上，當時國語學校師範部畢業的教師，也兼具低階文官（判任官）資格，學歷與資格合一的制度化特權，即為日後國語學校臺灣人畢業生成為地域社會中協助殖民統治新生力軍的主因。

³² 1853-1912年，北投堡頂茄荖人，1898年任南投辦務署參事，應當局之諮詢，以策鎮撫。洪火煉為其次子。洪敏麟總編輯，《草屯鎮誌》，頁933。

³³ 有關改正朔的實際情況，請參見顏杏如，〈二つの正月：植民地台湾における時間の重層と交錯（1895-1930年）〉，《日本台湾学会報》9（2007年5月），頁1-21。

³⁴ 〈草鞋墩民改奉正朔〉，《臺灣日日新報》，1915年12月22日，第6版。

其次，從他們被報評為「皆當地新進有為。熱心公益之人也」，亦可窺知所謂「新進有為」與「熱心公益」的舉止，正足以作為地域社會模範的標準。而這些「新進有為」青年，也正是殖民政府高度期待的對象。

第三，從報導中也可感受到洪清江除了盡心盡力推動教育外，對於區內住民的社會教化工作也不落人後，因此得到殖民政府的高度評價，始於 1920 年 6 月獲頒紳章。此外，當 1921 年臺灣文化協會設立而對青年層造成極大的影響後，殖民政府為了防堵臺灣文化協會倡議的臺灣人自治、臺灣人自覺風潮影響青年層，而自 1922 年起，在渥美庄長主導下，以通學區域為基準，積極動員組織設立各區的官製青年會（團）。根據 1926 年臺灣總督府所做的調查顯示，此時期草屯地域創設組織的青年團，概況如表一：

表一 草屯地域官製青年團設立概況一覽

青年團名	代表者	會員人數	創立時間	活動內容
土城青年團	洪周南 ³⁵	115	大正 11 年(1922) 10 月 30 日	國語普及會、圖書購入、道路指導標、模範共同耕作地經營、團旗製作、勤儉儲蓄、風俗改良。
永豐青年會	簡德生	34	大正 11 年(1922) 10 月	講話會、國語練習會、副業講習會。
新庄青年團	洪深坑	128	大正 12 年(1923) 3 月 11 日	國語普及會、指導標講習會。
溪州青年團	白龍樹	43	大正 12 年(1923) 10 月 2 日	家長會、主婦會、婦人會、夜學會、體育會、庭球會、水泳會、音樂會。
秀惠青年會	洪支山 ³⁶	32	大正 13 年(1924) 3 月 5 日	勸善會。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編，《青年會其ノ他社會教化的の団体調》（臺北：臺灣總督府內務局文教課，1926），頁 12；臺灣總督府編，《全島青年團、処女會、家長會、主婦會調》（臺北：臺灣總督府文教局，1926），頁 15-16。

由此調查可看出，洪姓一族出身的臺灣人教師，在草屯地域社會的官製青年團運動中，非常活躍搶眼。而在這份調查中，也可獲悉這些官製青年團（會）經

³⁵ 1900 年出生，草屯公學校畢業生，1920 年畢業於公立臺中中學校。許錫專編，《草屯地區開發史資料集》（南投：臺灣洪氏家廟、財團法人洪氏子女獎學基金會，1998），頁 280。

³⁶ 草屯公學校畢業。戰爭末期，與洪深坑等人同被任命為教化委員。許錫專編，《草屯地區開發史資料集》，頁 198。

費的主要來源，是由庄編列的補助金來維持運作。³⁷ 時人的評價，對當時擔任草屯庄助役的洪清江讚譽有加。例如 1935 年以臺中州管內名望人物作為品評對象的《新中州の展望》一書，即對洪清江的高明手腕給予如下評價：

君是草屯庄番子田人。郡下的名望家，受到庄民崇隆的尊敬和支持。從學成以來，君在現實社會中以明快的手腕瞬間獲得世人的注目，年紀輕輕便被拔擢為草屯庄助役，以庄長的左右手輔佐庄長，持續不斷地犧牲奉獻於財政、庄治甚至產業的發展上。今日同庄能有如此的發展，端賴君的努力之處實多。君可說是堪稱郡下唯一寶庫的草屯庄今後不可或缺的中堅人物。君不但頭腦聰敏社交靈活，堅信胸中偉大的抱負必將綱舉目張獲得斐然的成績，而在不久的將來成為庄長，切望更能繼續奮鬥不懈。家中長男耀勳君畢業於東大文科，目前擔任臺北帝大助手，次男耀〔按：耀〕堂君自醫專畢業後留學京都醫大，大好前途都是令人矚目的。草屯庄中家庭教育成功而能善於教導子弟前途的人家也不在少數，但能像君這樣圓滿發達者可謂不多。³⁸

由上述可知，洪清江不管在家庭或事業上（包括教師和助役），皆可謂一帆風順，因此在草屯地域內，作為殖民體制賦予的協助新領土經營角色來看，更被視為一種模範。

然而，受到時人高度期待、可能膺任「草屯庄長」的洪清江，最後卻無法如願，只能以助役一職結束公職生涯。這樣的結果，誠然與殖民體制一貫的民族差別待遇政策有關，更重要的因素，卻是頂頭上司渥美寬藏的存在。渥美自國語學校畢業後，即成為草鞋墩公學校首任校長，其後更長期擔任草屯庄長與改制後的草屯街長，以殖民統治者之姿君臨草屯地域。所以，即便臺灣人對洪清江更上層樓寄予厚望，終究無法打破渥美壟斷街庄長一職的局面。

但若從作為殖民統治輔助者的角度來看，對地域社會臺灣人的教育與教化工作，洪清江的付出與貢獻可說無人能及。即使 1936 年卸下助役一職，洪清江仍

³⁷ 臺灣總督府編，《青年會其ノ他社會教化的団体調》，頁 12；臺灣總督府編，《全島青年團、処女會、家長會、主婦會調》，頁 15-16。

³⁸ 林燕飛編，《新中州の展望》（臺中：締交通信社，1935），頁 292。

繼續擔任新設立的草屯信用購買販賣利用組合理事，並當選草屯街協議會員，直到日本戰敗為止，都獲得連任；³⁹ 而在皇民化運動如火如荼推動的過程中，亦與同為國語學校出身的親族洪深坑，被任命為部落振興會的教化委員。換言之，洪清江的殖民體制輔助及協力者角色，可說與殖民統治相始終，未曾一刻鬆懈。

然而，洪清江在 1920 年代同宗洪元煌與林獻堂等人所領導的臺灣人文化啟蒙運動中，卻也是一名重要的參與者。早在 1907 年左右，洪清江便曾參與草屯碧山吟社，與洪元煌等年輕世代藉由漢詩抒發心中對殖民統治的新仇舊恨，並與中部文人互通聲息。此外，前所引述 1915 年「改奉正朔」的報導中，同時刊登的新庄區「同宗」洪清江、洪元煌和洪錦水三人中，另外兩人可說自始至終，都是積極反抗殖民統治的政治運動家。洪元煌剛繼承其父洪玉麟擔任的媽助圳主事一職，更儼然成為洪姓一族的新領袖級人物；至於洪錦水，輩份也不在洪清江之下。若說他們完全聽從新任區長洪清江的意旨而贊同「同化」，實令人存疑。何況在這篇報導出現之前的 1914 年，由林獻堂等人主導的臺中中學校設立運動，正如火如荼地在全臺各地展開；此時在草屯地域慷慨解囊而留下紀錄的，即包括洪清江的兄長洪獻章和洪錦水。⁴⁰ 揆諸當時草屯地域的實態，及以林獻堂為首的臺灣人鄉紳階層所稱「同化」背後隱含的自治意義，⁴¹ 其在表面上「迎合」殖民統治權力的同時，亦藉此思考如何維持臺灣人地域社會自治的政治意識，可能更貼近事實。⁴² 所以，若單純地將後來的「改奉正朔」認為係新庄區洪姓一族呼應全臺各地展開的「同化」運動之性質理解的話，可能過於簡化。

此外，1920 年臺灣地方制度改正後，儘管洪清江被拔擢為助役，且從 1922 年起協助渥美庄長推動草屯地域官製青年團的設立，充分發揮協助新領土經營的角色；但當 1924 年臺灣文化協會於臺南市舉辦第 3 次定期總會時，來自草屯的洪清江、洪元煌、林野和賴金圳等亦皆當選理事，洪獻章甚至被選為評議員。⁴³ 殖

³⁹ 洪敏麟總編輯，《草屯鎮誌》，頁 341。

⁴⁰ 根據 1932 年所立的公立臺中中學校〈本校創立記念碑〉捐贈者名單，來自草屯地域的捐贈者至少包括李春盛、黃春帆、李其昌（應為李昌期之誤）、洪錦水、洪獻章和張玉書等人。參見葉榮鐘，《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臺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00），上冊，頁 66。

⁴¹ 許世楷，《日本統治下の台湾：抵抗と弾圧》（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72），頁 173；若林正文，《台湾抗日運動史研究》，頁 43-44。

⁴² 洪元煌便是最佳例證。參見陳文松，〈洪元煌の抗日思想：ある「台湾青年」の活動と漢詩〉，頁 67-92。

⁴³ 葉榮鐘，《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下冊，頁 338。

民當局視為新庄區「新進有為」青年的洪清江、洪元煌和洪錦水，⁴⁴ 更在 1924 年成為草屯炎峰青年會⁴⁵ 創立時的核心人物。而炎峰青年會成立時的事務所，即設在庄役場內，這與助役洪清江的參與支持，應有密切關係。在 1927 年發生臺灣文化協會分裂與炎峰青年會轉向支持臺灣民眾黨的階級鬥爭以前，洪清江不但一貫且公開地支持提升臺灣人文化，並且參與爭取臺灣人自治的文化啟蒙運動。

在作為殖民政府地方行政末端官僚一員的同時，洪清江也在 1925 年與草屯地域的「智識階級」共同投入炎峰青年會舉辦的農村講演會，以及國語教育普及工作。對此，《臺灣民報》有如下詳細的報導：

草屯人士洪獻章、李春喙、洪元煌、李春盛、洪清江、洪獻奎、林野、洪應用諸氏約三十名，對於地方文化之啟發，非常熱心，定六月一日起至同月十一日止，諸氏親出郡下十一處講演。以炎峯青年會主倡，各界智識階級皆出後援，並用樂隊宣傳，聽者非常多數，每夜七、八名講演，或講農村問題、或關教育問題，並及婦人問題、經濟問題，各方面之研究，皆熱心發表，大有裨益於民眾。奈講演中受二次中止。⁴⁶

報導中所列的演說者名單，最搶眼的莫過於出身洪姓同族的洪元煌、洪獻章、洪獻奎、洪清江、洪應用等人，以及出身李姓家族的李春盛、李春喙兄弟。其中，李春盛、洪獻章、洪清江和洪元煌 4 人都曾先後領受過紳章。⁴⁷ 當天演說的主題，從農村問題到教育問題、婦人問題、經濟問題等，幾乎無所不包；不過，報導也指出，演說過程曾被警察要求「中止」兩次。由此可知，在前述官製青年團運動

⁴⁴ 1928 年的《臺灣民報》中，曾稱洪錦水為「草屯的嘲諷師（草屯の皮肉家）」，而洪錦水便曾對草屯地域以中等學歷者為對象所成立的玉峰俱樂部，展開冷嘲熱諷的批判。參見〈如是我聞〉，《臺灣民報》223，1928 年 8 月 26 日，第 12 版。

⁴⁵ 草屯炎峰青年會於 1924 年 10 月 28 日由洪元煌所創設，起初被臺灣總督府視為臺灣文化協會外圍青年團體之一，後隨著 1927 年文化協會左、右派路線之分裂，先後成為右派臺灣民眾黨（1927-1931）以及臺灣地方自治聯盟（1930-1934）之南投支部，可說是日治時期壽命最長且最為活躍的非官製青年團體。就屬性而言，從 1920 年代前期的文化啟蒙運動，一直到中後期成為政治團體後所推動的社會、政治、自治、反殖民專制統治運動，可說無役不與。而在草屯地域社會當中，更是唯一具有整合草屯地域青年有志的代表性青年團體。參見陳文松，〈洪元煌的抗日思想：ある「台湾青年」の活動と漢詩〉，頁 67-92。

⁴⁶ 〈各地文化講演情報 草屯〉，《臺灣民報》60，1925 年 7 月 12 日，第 6 版。

⁴⁷ 張家綸，〈草屯地域與社會菁英（1751-1945）〉，頁 87-89。

中，洪姓一族協助甚多，從國語普及、耕地、風俗改良到副業推廣，皆熱心參與。洪清江既屬洪姓出身又出任助役，當有獎勵之功；但在炎峰青年會主導舉辦攸關草屯地域農村、教育、婦女或經濟問題的演講上，卻因涉及「政治性」，即使身兼助役的洪清江參與其中，也無法擺脫警察的干涉。

1927年1月臺灣文化協會左、右分裂，右派的蔣渭水遂於同年7月另組臺灣民眾黨。而緊接著同年10月，以溫和穩健著稱的林獻堂等地主階層，也陸續宣布不再參加由左派連溫卿所主導的新文協。此時，正式宣布退出新文協的名單中，來自草屯地域者，至少包括洪元煌、賴金圳、李春嘯、洪獻章、洪右、洪源福、洪汝祥、洪承箕和林野等，而洪清江也是其中之一。⁴⁸ 這些人可說是當時草屯地域炎峰青年會的核心人物。

即使如此，在島內政治運動紛亂之際，私底下立場不同的人物仍經常出現在婚喪喜慶的場合。例如1927年1月，洪清江的長男洪耀勳⁴⁹迎娶臺中大甲出身、時為臺灣民眾黨幹部的吳淮水⁵⁰胞妹吳琇進。結婚典禮由洪元煌擔任媒人，並邀請林獻堂擔任立會人（證婚人）。典禮在臺中基督教堂舉行，除了雙方家長外，草屯地域重要人物，包括李昌期、賴金圳、洪獻章、洪元煌、黃春帆、李春盛和張玉書等人都應邀出席。而渥美寬藏庄長也受邀參加婚宴，主要來賓共有20多人。⁵¹

不久，洪元煌率領的炎峰青年會正式成為臺灣民眾黨的南投支部，並展開全島各地的政治運動。從原來殖民政府認可的文化團體，轉變成眼中釘的政治團體後，終於導致渥美庄長與洪元煌師生之間齟齬日深，不惜撕破臉。1927年，在一場草屯地域所有官製青年團的聯合會上，渥美庄長首次公開嚴詞批判由其子弟兵組成的炎峰青年會。⁵² 如此，也逼使洪清江不得不和炎峰青年會劃清界限，以表

⁴⁸ 〈脫離文協的署名者〉，《臺灣民報》177，1927年10月9日，第4版。

⁴⁹ 東京帝國大學畢業，1932年為慶祝《臺灣新民報》日刊發行而發表一篇關於創造臺灣人的語言的文章。洪耀勳，〈創造臺人的言語也算是一大使命〉，《臺灣新民報》400，1932年1月30日，第11版。

⁵⁰ 隨後不久，同年9月吳淮水被選為臺灣民眾黨第一回中央常務委員，洪元煌則當選同黨社會部的幹部。（《臺灣民報》175，1927年9月25日，第3版。）此外，吳淮水乃1915年3月畢業於國語學校國語部。參見臺北師範學校創立三十周年紀念祝賀會編，《臺北師範學校卒業及修了者名簿》（臺北：該會，1926），本島人之部，頁129。

⁵¹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一）》（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2004），1927年1月23、25日，頁48、51。

⁵² 〈庄長的暴言〉，《臺灣民報》178，1927年10月16日，第6版。

明態度。⁵³

儘管在渥美庄長嚴厲批判後，洪清江對炎峰青年會推動的政治運動採取敬而遠之的態度，但對該會所舉辦針對地域住民的社會教育、國語教育和業佃問題調解等未抵觸殖民政政策的各類活動，依舊非常熱心推動並參與其中。例如 1928 年，炎峰青年會的外圍團體——由洪元煌倡議以洪姓「親族」為成員組成的番子田共榮會，舉辦的夜學會組織中，教授國語科的教師，即為國語學校師範部畢業的洪清江和洪深坑。⁵⁴ 此外，1934 年 6 月，為緩和佃農和地主之間的農業紛爭，山口草屯庄長在率團公開訪問霧峰林獻堂的坑口自治村⁵⁵ 行程中，即有洪元煌和洪清江等 30 多位草屯住民連袂前往。⁵⁶

透過以上議論，可針對洪清江在地域社會中扮演的角色，提出以下的小結：首先，在草屯地域中，第一位來自國語學校師範部的臺灣人畢業生洪清江，歷任公學校教師、地方行政職務的區長和助役，以及民間產業組合的要職等，以協助內地人校友的校長及庄長（渥美寬藏任期最長）遂行殖民統治，並且擔任地方官廳第二號人物的助役一職。作為「新領導經營者」搭檔的「渥美·洪清江」體制，一直持續到 1936 年。洪清江一開始便支持並參與同族洪元煌率領的文化啓蒙運動，此使身為統治者的渥美庄長，在起初亦公開出席文化協會相關活動。⁵⁷ 然究其實，臺灣文化協會自設立開始，警察當局便對以洪元煌為首的洪姓一族參與者，保持高度政治警戒；尤其自 1926 年文教局設立後，更開始強化對青年層的思想統制，其影響馬上波及地域社會。這點從 1927 年渥美庄長對草屯炎峰青年會的嚴詞批判，即可推想而知。而更具體的則是新庄公學校的臺灣人教師洪深坑，其被指派參加全島性與地方性的青年團講習會。

誠如上述，在炎峰青年會變成民眾黨南投支部、正式公開投入政治運動後，洪清江即對任何高度「政治性」的運動敬而遠之。但作為洪姓家族的一份子，洪

⁵³ 洪清江本身還以受過中等教育者為對象，成立新的玉峰俱樂部。〈如是我聞〉，《臺灣民報》223，1928 年 8 月 26 日，第 12 版；〈玉峰俱樂部的本體〉，《臺灣民報》225，1928 年 9 月 9 日，第 3 版。另參見宮崎聖子，《植民地期台灣における青年団と地域の變容》，頁 86。

⁵⁴ 〈地方通信 草屯創設夜學會〉，《臺灣民報》218，1928 年 7 月 22 日，第 7 版。

⁵⁵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六）》，1933 年 11 月 7 日，頁 428。

⁵⁶ 「草屯庄長山口孫一郎，洪元煌，洪清江外二十九人來視察坑口自治村，並來訪問及觀菜園。余使添財準備米粉在圖書室午餐，又使猶龍，萬生招呼並說明。」（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七）》，1934 年 6 月 10 日，頁 233。）行前 6 月 8 日，洪元煌還特地向林獻堂打招呼（同書，頁 231）。

⁵⁷ 〈草屯庄青年團 發會式〉，《臺灣日日新報》，1924 年 11 月 3 日，第 1 版。

清江仍積極參與由炎峰青年會推動的各項社會教育與農村教育工作。因此，與其說洪清江對於洪元煌等人領導的抗日運動採取對立的態度，⁵⁸毋寧說他的付出與投入並不下於其他洪姓同族。而隨著 1930 年代中葉臺灣島內政治運動的低迷，卸下公職的洪清江轉換舞台，一方面加入由同族洪火煉（前述洪聯魁之子）⁵⁹ 等人組成的新組合，一方面協助殖民政府在戰時推動各項社會教化工作。在長達半世紀的殖民統治下，如此多元多重的角色及各類職務的轉換，可說正是雙語學歷菁英的最大特徵。

三、地域社會青年教化的指導者： 洪深坑（1897-1941）

與洪清江幾乎相同路徑，即國語學校畢業後，長期任職草屯地域公學校的臺灣人青年教師，日後亦參與炎峰青年會，推動社會教化工作的洪姓族人，還有一位，就是前述的洪深坑（1897-1941 年）。根據《洪氏族譜》的記載，洪深坑的兄弟，包括有洪上壁（螟蛉子）、洪上珍（啓成）、洪上琳和洪上攀；至於其膝下，則育有洪育錡、洪育砵、洪育綸、洪育樵、洪育雄和洪育培 6 子（參見圖一）。洪深坑的相關資料並不多，除了少數有關炎峰青年會的新聞報導略有觸及外，本文主要仰賴三男洪育綸先生的口述訪談，⁶⁰ 以及洪育綸先生惠予提供的珍貴老照片。藉由上述基本史料，或能描繪洪深坑一生大略的雛形於一二。

以往的研究中，率先也是唯一關注過洪深坑的，是日本學者駒込武所發表的論文。論文中，駒込武提及 1930 年代洪元煌領導的炎峰青年會，在向殖民政府提出的教育要求中，當時身為新庄公學校訓導的洪深坑，如何透過地域住民的參加，凸顯其政治訴求的重要側面。對此，駒込武的論文描述如下：

⁵⁸ 駒込武認為，曾擔任草屯公學校教師而於 1928 年時仍任職草屯庄助役的洪清江，與炎峰青年會是相互對立的存在。（參見駒込武，〈抗日運動における教育要求と總督府の教育政策：1920-1930 年代台中州草屯庄の事例を中心に〉，頁 433。）但根據本研究，筆者認為兩者之間其實並非是相互對立的。1888-1953 年。其生平請參見洪敏麟總編輯，《草屯鎮誌》，頁 938-939。

⁶⁰ 洪育綸先生訪談：2002 年到 2006 年之間進行數次錄音訪談，地點都在洪育綸先生位於草屯稻香村的家中。以下簡稱〈洪育綸先生訪問紀錄〉（訪問人：筆者，未出版）。

〔按：以新庄公學校所舉行的學藝會為例〕炎峰青年會的一員洪深坑當時是新庄公學校的教員，透過以該會成員為中心所組織的父兄會，摸索著藉由各種形式來塑造「團結」的氣氛。同時，若聯想起該會成立當時便是以戲劇運動而發端，如此這齣戲劇（『虎と蟻』）絕對不能說是無心之作。而且即使這是件非常困難的事，洪深坑仍憑著不屈不撓的精神，不間斷地試圖將公學校轉化改造成為在現實社會中，對地域住民真正具有公共性教育機關的用心，這個可能性是很高的。⁶¹

對於駒込武指出的「試圖將公學校轉化改造成為在現實中，對地域住民真正具有公共性教育機關」觀點，本文認為相當值得玩味。⁶² 藉由這項提示，可引發我們對洪深坑在殖民地社會中究竟扮演何種角色興趣的探究。

其實，洪深坑原本並非草屯洪姓親族的一員。洪深坑，原名褚深坑，1897年出生貓羅堡。根據洪育綸先生的回憶，洪深坑的生父褚匏以種植甘蔗為生，他的兄長褚讚登則擔任保正。社口公學校畢業後，洪深坑考上國語學校師範部。1919年畢業後，曾先後擔任臺中塗城公學校和母校社口公學校的訓導。1920年，以招贅婚的方式，與草屯庄番子田文秀才洪獻章的長女洪氏卿結為夫妻，同時被洪獻章收為養子（螟蛉子），將姓氏由褚姓改成洪姓。在目前留存的日治時期洪獻章戶口名簿中，對此有明確的紀錄：

事由：臺中廳貓羅堡同安寮庄二百番地褚讚登弟大正九年四月十六日婚姻
入戶 大正九年四月十六日養子緣組
續柄：螟蛉子 父褚匏 母褚謝氏嫌 出生別五男 長女洪氏卿ノ夫招婿 生
年月日明治三十年五月三日

芬園一地緊鄰草屯，被認為是洪獻章等洪姓先祖，在十八世紀前半移居草屯地域前的定居地，⁶³ 因此，對草屯番子田洪姓一族來說，絲毫沒有所謂地理上的隔閡。

⁶¹ 駒込武，〈抗日運動における教育要求と総督府の教育政策：1920-1930年代台中州草屯庄の事例を中心に〉，頁437-438。

⁶² 公學校與地域社會的關係，可參見許佩賢，〈臺灣近代學校的誕生：日本時代初等教育體系的成立（1895-1911）〉（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暨研究所博士論文，2001），第4章，頁195-278。

⁶³ 洪敏麟總編輯，〈草屯鎮誌〉，頁187。

所以，當該地有年輕一代畢業於國語學校時，很難不受矚目，並難逃文秀才洪獻章的慧眼。包括洪獻章之弟洪清江，其在當時的新聞報導中被刻意註明「國語學校師範部畢」的作法，即證明國語學校畢業生於當時臺灣社會上的地位，宛如象徵近代學歷社會的同義詞。對於洪深坑來說，能成為草屯地域最具聲望的洪姓家族成員，除了傳統漢人家族透過招贅收養以傳宗接代這層含意外，亦因他具有高學歷，才得以「結婚入籍」草屯四大姓之一的洪姓，這也再次說明從重視傳統科舉功名過渡到新式學歷社會的變化。換言之，傳統漢人的家族傳承與近代學歷社會兩種不同的要素，於此相互融和在一起。

曾經於就讀新庄公學校時，被洪深坑教過的同族子弟洪樵榕（洪火煉之子），在回憶當時的臺灣社會時指出：「由於進入師範學校者，多係社會上之佼佼者，日久逐漸成為社會領導階層之代表，也是當時女子結婚對象的優先選擇之一。」⁶⁴ 有趣的是，當時由國語學校畢業生成為草屯女婿的人，除了洪深坑外，還有下文將提到的吳萬成（南投郡南投街，洪元煌的女婿），以及另一位在臺灣文壇頗富盛名的黃洪炎⁶⁵（南投郡名間庄出身，李春盛的女婿）。

在深入討論洪深坑之前，有必要針對《臺灣列紳傳》對其「養岳父」洪獻章的描述，略加討論。何以故？因由此可幫助後人了解洪深坑與洪獻章、洪清江、洪元煌（以上同屬草屯番仔田）以及洪火煉（草屯頂茄荖）等親族間的相互關係；並對洪獻章的為人和政治參與論述，有助於進一步了解洪深坑的社會、政治實踐。對於洪獻章，《臺灣列紳傳》如此記載：

洪獻章好箇青衿子也。為人重厚溫雅。志操頗高潔。自幼好學。髫髻略通大義。光緒十八年〔按：1892〕應縣考試。榜名秀才。復航海遊于福州。受業于林元廣門。學力頓進。其家世以富有名。今約三萬圓。惟以保正為己職。閑居讀書。高尚其事。人若謀以公益。棄財不惜。救荒恤貧。德望愈高。大正四年十一月授紳章。年今四十四。⁶⁶

⁶⁴ 洪樵榕口述，歐素瑛、卓遵宏訪問，歐素瑛記錄整理，《洪樵榕先生訪談錄》（臺北：國史館，2001），頁24。

⁶⁵ 張淑玲，〈臺灣南投地區傳統詩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03），頁205-212。

⁶⁶ 臺灣總督府編，《臺灣列紳傳》（臺北：臺灣總督府，1916），頁224-225。

為公益「棄財不惜」的文秀才洪獻章，曾在 1914 年捐款臺中中學校設立運動，並從 1923 年 6 月起，陸續擔任抗日運動的機關刊物《臺灣青年》、《臺灣》和《臺灣民報》的經營母體——株式會社臺灣雜誌社的相談役（顧問職），⁶⁷ 和擔任臺灣文化協會評議員等，1924 年也加入洪元煌創辦的草屯炎峰青年會。

1927 年 8 月，臺灣民眾黨南投支部（由居住在霧峰、草屯和南投的會員組成）的成立大會（議長洪元煌）上，洪獻章站上講台，發表紀念性的演講，中途遭警察要求中止。對此，《臺灣民報》大表不平地指出：「草屯宿儒洪憲〔按：獻〕章茂才登壇，以闡述團結之必要為要旨，引古證今，大揮雄辯，言々句句全都發自內心真誠勉勵後輩，不料卻因臨監警察官的猜忌而被令中止。」⁶⁸ 其後，同報又在隔週的小專欄中，發表對當局處置不當的諷刺性文章，文中指出「南投支部的發會式中，連六十老人〔按：當時應為 55 歲〕洪憲〔按：獻〕章氏發表祝辭都被中止。連喜怒哀樂都不能自由陳述的臺灣人，真是可憐之至啊！」⁶⁹ 隔年 9 月，洪獻章即因病過世。⁷⁰ 總之，洪獻章雖曾於 1915 年獲頒紳章，但從臺中中學校設立運動起，洪獻章對於臺灣人自治與反對同化的社會、政治、文化等運動，幾乎無役不與。甚至到去世前一年，還替臺灣民眾黨南投支部站台演講，呼籲臺灣人要「團結」，而這樣的熱情相挺，形同對同族洪元煌的最大支持。

無獨有偶，身為洪獻章養子的洪深坑，在其養岳父去世後不久的 1932 年，利用於公學校演出的〈虎與蟻〉一劇，描繪出「兇惡的猛獸之王的一匹老虎被大批螞蟻咬得痛苦不堪，最後終於不支倒地，螞蟻們見狀紛紛高喊著『團結就是力量』」的劇碼。⁷¹ 此劇本究竟成於何時不得而知，因此無法推定是否與洪獻章在 1927 年發表的演講內容有直接關聯。即使如此，大聲疾呼在殖民統治者（虎，強者）面前的臺灣人（蟻，弱者），應該「團結」一致以相抗的意圖，卻具體呈現在這對「父子」身上，前後輝映。

⁶⁷ 〈株式會社臺灣雜誌社成立〉，《臺灣民報》4，1923 年 7 月 15 日，第 11 版。另外也包括出任監察役（監事）的洪元煌。

⁶⁸ 〈民眾黨支部發會式〉，《臺灣民報》169，1927 年 8 月 14 日，第 3 版。

⁶⁹ 〈如是我聞〉，《臺灣民報》170，1927 年 8 月 21 日，第 11 版。

⁷⁰ 洪敏麟總編輯，《草屯鎮誌》，頁 934。

⁷¹ 駒込武，〈抗日運動における教育要求と總督府の教育政策：1920-1930 年代台中州草屯庄の事例を中心に〉，頁 437。

入贅成為洪姓一族的 1920 年起，一直到 1934 年為止，洪深坑都服務於當地的草屯公學校新庄分教場（後升格為新庄公學校，參見圖二），長達 10 多年。期間，作為國語學校畢業的臺灣人教師，當殖民政府開始在草屯地域推動官製青年團之際，洪深坑很快便受到矚目。如前所述，從 1922 年起，草屯庄的官製青年團便開始以各通學區域為範圍相繼創設，其中會員人數最多的，便屬新庄青年團，洪深坑即為負責人。1928 年 1 月 12 日，臺灣總督府文教局與大日本連合青年團⁷² 首次聯合舉辦的「第二屆青年團指導者講習會」在北部淡水召開，時任南投郡新庄公學校訓導的洪深坑，是郡下少數被推派參加的臺灣人代表。⁷³ 當時，全臺各地得以出席盛會的總人數不及百名，清一色是擔任公學校訓導與社會教化相關工作的人物。當時夙有日本「青年團之父」之稱的田澤義鋪，⁷⁴ 也應昔日盟友臺灣總督府總務長官後藤文夫之邀初次來臺。之後，為了協助後藤在臺推展官製青年團，包括田澤在內的大日本連合青年團主要幹部都相繼來臺，舉辦各種青年團研習活動。⁷⁵ 而在 1932 年 1 月，由南投郡主辦的南投連合青年團幹部講習會，洪深坑也沒有缺席（參見圖三）。

換言之，在草屯地域的「渥美・洪清江」體制下，身為新庄公學校訓導的洪深坑，在草屯庄官製青年團推動過程中，扮演的角色非常吃重。從另一方面來看，作為洪姓一族的新成員，洪深坑對洪獻章長期支持，而由洪元煌所領導的抗日運動，也是不餘遺力的積極參與，且更甚於洪清江。

1928 年，洪元煌在以洪姓一族為主的番子田發起設立共榮會。同年 7 月，洪右等人組織夜學會，教授該聚落的子弟國語、漢文、法律和農業等 4 門課程。而每門課程的講師，則分別是：國語科——洪清江、洪深坑，漢文科——洪元福、洪廷基，法律科——洪元煌、洪右，農業科——洪水牛、洪炳癸。⁷⁶ 隔月，番子

⁷² 1924 年 10 月創立，前身為中央報德會青年會，屬半官方的青年團統制機關。成立後在各地舉辦講習會，殖民地朝鮮、臺灣也都曾派代表參加。1941 年又改編為大日本青年團。

⁷³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306（1928 年 2 月），頁 136-137。

⁷⁴ 1885-1944 年，日本佐賀縣人，是日本近代青年教育、政治教育的推動者之一，與後來擔任臺灣總督府總務長官後藤文夫等人，於 1924 年 10 月創立大日本聯合青年團，被稱為「青年團之父」。主要著作〈青年團の使命〉等文章，皆收於田澤義鋪記念會編，《田澤義鋪選集》（東京：田澤義鋪記念會，1967）。

⁷⁵ 陳文松，〈1920 年代殖民地台灣における「青年」の争奪：台湾總督府文教局の設立と後藤文夫〉，《アジア地域文化研究》1（2005 年 3 月），頁 17-37。

⁷⁶ 〈地方通信草屯 創設夜學會〉，《臺灣民報》218，1928 年 7 月 22 日，第 7 版。另參見駒込武，〈抗日運動における教育要求と總督府の教育政策：1920-1930 年代台中州草屯庄の事例を中心に〉，頁 433-435。

田正式改稱稻香村，番子田共榮會自此更名為稻香村共榮會，並首次召開成立大會。有關當天的情形，《臺灣民報》報導如下：

既報于本月十日開過發起人會的稻香村共榮會、果於月之十二日在稻香村公會堂舉行發會式了。其開會順序：洪深坑氏述開會辭、洪右氏報告創立經過、公推洪元煌氏為議長、洪水牛洪廷基為書記、討論議事修正會則、選舉委員、委員敘禮、來賓祝辭、吳萬成氏披讀各地祝詞祝電、洪廷基氏宣告閉會。是日列席會員和來賓八十餘名、頗呈盛況、至午後六時許始散會云。⁷⁷

其後，洪深坑對共榮會所舉辦的各式活動，包括音樂會、衛生講演會，以及有關農村生活改善方面等，均全力協助洪元煌來推動。其中，農業問題更是對以農業為發展根基的草屯地域，具有密不可分的關係。⁷⁸ 當時，為了開發農村新的副業與推廣農法改良，洪元煌和洪深坑還特別組成視察團，到鄰近的彰化郡和美及線西實地考察，冀圖提高農民收入。⁷⁹ 又如，因養豬為農民的主要副業之一，⁸⁰ 為了改良豬隻的品種以增加農民收入，洪元煌和洪深坑亦投入豬隻的品種改良。

草屯庄稻香村洪元煌、洪深坑諸氏，為欲圖豚種的改良，於去年熱心鼓舞村民建築改良豚舍，由豐原臺中方面購買純種的英國種豚，現已生產很多子豚，發育很好，擬欲分讓於近隣，故鄉村的畜產可望發達云。⁸¹

除了到和美和線西考察以外，草屯庄官民一行，也曾在 1934 年 6 月 10 日前往全島知名的霧峰坑口農事自治村實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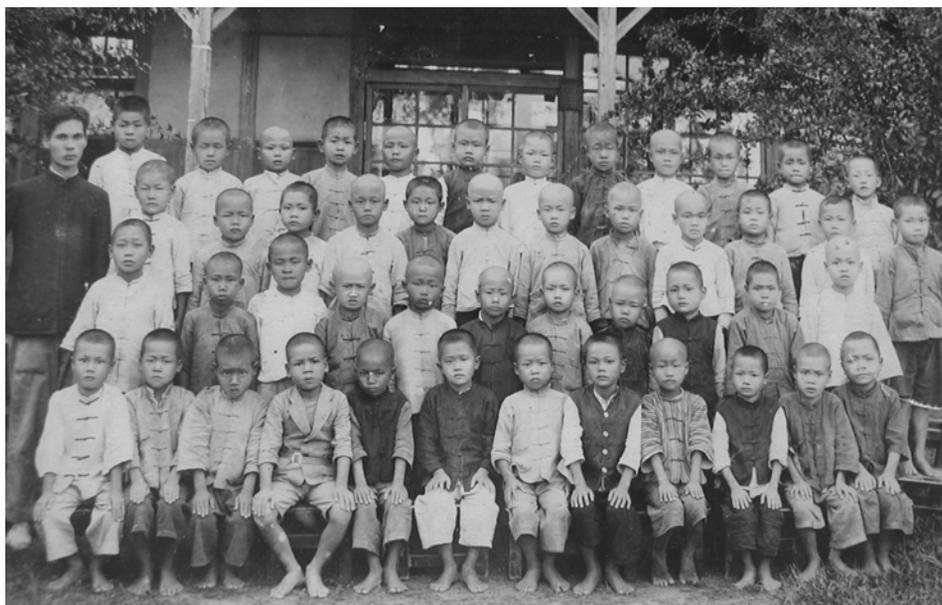
⁷⁷ 〈地方通信草屯 共榮會發會盛況〉，《臺灣民報》223，1928 年 8 月 26 日，第 7 版。另外根據當時警察方面的資料，對於該會有如右的記載：「稻香村共榮會 昭和 3 年 8 月 12 日創立 團體員數 83 主なる者の氏名 洪元煌 吳萬成 洪添福 洪右」。參見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吳密察解題，《臺灣社會運動史》（臺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1995），頁 456。

⁷⁸ 根據《草屯鎮誌》的資料顯示，1929 年時草屯的農業人數為 18,759 人，占全體總人數（24,926 人）的 75%。洪敏麟總編輯，《草屯鎮誌》，頁 418。

⁷⁹ 〈地方通信草屯 老農實驗留株 有志擬欲視察〉，《臺灣新民報》380，1931 年 9 月 7 日，第 8 版。

⁸⁰ 洪敏麟總編輯，《草屯鎮誌》，頁 465。

⁸¹ 〈地方通信草屯 洪君鼓舞養豚 畜產可望發達〉，《臺灣新民報》385，1931 年 10 月 10 日，第 9 版。



圖二 洪深坑和學生合照

資料來源：洪深坑之子洪育綸先生提供，謹此致謝。



圖三 1932 年的南投郡青年團幹部講習會

資料來源：洪深坑之子洪育綸先生提供，謹此致謝。

說明：1932 年 1 月 21 日，洪深坑（第三排，左四）參加南投聯合青年團幹部講習會。

綜合上述可知，不管是在普及國語教育方面，或是發展農村經濟層面上，洪深坑都積極而不落人後。這些活動不但符合官製青年團的教化方針，也與洪元煌所堅持且持續推動維繫農村自治的精神一致。從結果來看，洪深坑等人乃是透過自發性的努力，推動地域社會的發展，進行農民生活的改善和農法的改良，相當程度上直接帶動了農村的近代化進程。

然而，由於殖民政府對於臺灣農村的層層管控和剝削，以及 1920 年代後半世界經濟不景氣的波及，洪深坑為突破殖民地農村社會的困境，積極參與洪元煌領導的炎峰青年會，從事社會、政治運動，扮演農民的代言人。洪深坑亦對官方所倡議以地主為主體的興農倡和會，以及長期剝削廣大農民的明治製糖會社，展開強烈的批判。

例如，1927 年 10 月炎峰青年會召開第三次會員大會，洪元煌連任會長，令人矚目的是副會長首次由洪獻章的婿養子洪深坑出任。經過會員的熱烈討論，確認該會將以提升地方文化與推動社會公益事業，作為今後青年會的重點任務。⁸²然而，這次大會也凸顯出炎峰青年會面臨的困境。如前所述，自從炎峰青年會變成臺灣民眾黨南投支部展開政治活動以來，不斷遭受來自行政當局（庄長）和警察方面的批判與干涉，導致該會的會員人數逐步減少。

1930 年 8 月，當林獻堂等人宣布脫離涉入無產階級運動的臺灣民眾黨，轉而支持由楊肇嘉為首，以推動地方自治實施為單一運動目標的臺灣地方自治聯盟後，洪元煌也成為該黨人身攻擊的目標。⁸³同年 12 月 5 日，洪元煌終被臺灣民眾黨片面宣布除籍。⁸⁴因此，炎峰青年會再度化身為臺灣地方自治聯盟的南投支部，繼續從事相關活動。洪元煌與洪深坑等幹部經過深刻的討論，希望能以此為契機，讓炎峰青年會重生，便於 1931 年 4 月改組炎峰青年會。5 月 17 日召開改組後首次會員大會，經過投票之後選出「委員長洪元煌，常務委員洪錦水、洪右、洪緝洽、洪朝東、林金釵諸氏，委員黃洪炎、洪欽堯、洪源福、洪水牛、洪深坑、曹炯朴、洪江海、林守章、林野、王松根諸氏。」由此可知，洪深坑也當選委員。

⁸² 〈地方通信草屯 青年會總會〉，《臺灣民報》181，1927 年 11 月 6 日，第 6 版。

⁸³ 詳見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三）》，1930 年 8 月 10 日，頁 266。

⁸⁴ 〈加入自治聯盟的民黨員被除名 南投支部解散〉，《臺灣新民報》343，1930 年 12 月 13 日，第 2 版；洪敏麟總編輯，《草屯鎮誌》，頁 918。

當天晚上舉行紀念講演會，主要由臺灣地方自治聯盟楊肇嘉和主要幹部輪番上場發表演說，聽眾達 400 多名。⁸⁵

綜合以上討論，可看出作為新庄公學校教師的洪深坑，從 1921 年到 1930 年代初期，對於臺灣總督府由上而下所推動而在草屯庄主導施行的青年教化運動、青年團的設立，以及青年團指導者的培育等一連串工作中，均扮演吃重的角色；而另一方面，洪深坑作為洪姓一族的新成員，從 1928 年以後傳承養岳父洪獻章的角色，對於洪元煌領導從事的文化啟蒙運動、政治運動、社會教育，以及農村改良運動方面，更是毫無顧慮的積極參與，這點剛好與洪清江的「知難而退」有明顯差異。不過，洪深坑與吳萬成不同的是，他並沒有露骨地批判「島政」的言論或行動，而且始終停留在「學校體制內」從事「庄政」改善。

1934 年以後，長期由林獻堂、洪元煌等人發起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被迫停止，而草屯地域的新、舊兩信用組合也宣告合併。⁸⁶ 其間，洪深坑辭去長年擔任的教職，先後受聘於草屯舊、新組合，擔任要職。對活躍於信用組合的洪深坑，1935 年由林燕飛編著的《新中州の展望》一書，給予如下的評價：

草鞋墩信用組合常務理事 洪深坑君

君是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出身，前後十五年間在各地公學校任教服務，自從昭和八年四月出任草鞋墩信用組合常務理事以來，全力投入組合事業的發展與擴張，既已為世人所熟知。⁸⁷

1937 年，隨著中日戰爭的爆發，臺灣農村經濟大受影響，殖民政府所推動以皇民化運動為主的各項教化運動，亦於此時在全臺各地如火如荼地展開，洪深坑則被任命為社會教化委員。雖然辭去教職專心投入組合的工作，然而根據洪育綸先生的回憶，大環境的惡化與新舊組合的人事紛爭難解，洪深坑周旋兩端，終致

⁸⁵ 〈炎峰青年會 開改組總會 夜開紀念政談〉，《臺灣新報》365，1931 年 5 月 23 日，第 4 版。

⁸⁶ 「舊組合」指 1914 年由李春盛、李昌期等人設立參與的草鞋墩信用組合，而「新組合」則指 1930 年由殖民當局慫恿李昌期家族和洪火煉等人設立兼營農倉的草屯信用購買販賣利用組合，兩者於 1934 年在南投郡守主導下合併。草屯新舊組合併問題，請參見駒込武，〈抗日運動における教育要求と總督府の教育政策：1920-1930 年代台中州草屯庄の事例を中心に〉，頁 429；張家綸，〈草屯社會發展與地方菁英（1751-1945）〉，頁 135-158；陳文松，〈植民地支配と「青年」：台灣總督府の「青年」教化政策と地域社会の変容〉（東京：東京大学総合文化研究科地域文化研究専攻博士論文，2008），頁 239-246。

⁸⁷ 林燕飛編，《新中州の展望》，頁 308。

心力交瘁而因病告終。

洪育綸描述其父洪深坑在擔任公學校教師期間，即使下課後仍免費替洪火煉與洪姓親族的學子們補習課業，而由其母教授漢文，洪深坑本人則負責國語（日本語）。此外，為了改善家計，洪深坑購入附近一片山林，種植經濟作物，⁸⁸ 並交由洪育綸等兄弟看管。不過，這項新事業卻遭無情暴風雨摧毀，改善家庭生計的願望亦告落空。而在擔任新組合的職務（信用部主任）後，洪深坑經常處在形同水火的親族洪火煉與洪元煌間，進行調解和溝通。⁸⁹ 雖然疲於奔命卻又兩面不討好，就在 1941 年的某一天晚上，為了組合的事，極力調解洪元煌與洪火煉歧見後的返家途中，原本身體就虛弱的洪深坑，由於過度勞累又受大雨澆淋，終於倒下而一病不起，享年 44 歲。⁹⁰

總之，洪深坑這位國語學校畢業的雙語學歷菁英，不管是殖民政府在 1920 年代推動的官製青年團運動，抑或是 1930 年代皇民化運動時期的社會教化運動，都充分扮演青年教化政策協力者的角色。另一方面，作為洪姓一族的成員，洪深坑繼承養岳父洪獻章的衣鉢，並擔任炎峰青年會副會長，對於洪元煌推動的臺灣人社會、政治運動、農村改良、國語普及和社會補習教育等，劍及履及；並在洪火煉主導的新組合業務中全力投入，對促進地域社會發展和團結之努力，可說死而後已。

四、洪元煌的乘龍快婿兼左右手：

吳萬成（1902-？）

日治時期同樣自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畢業，活躍於草屯地域的雙語學歷菁英，除洪清江和洪深坑之外，第三人則是洪元煌的乘龍快婿兼左右手吳萬成。

⁸⁸ 據同族後人洪敏麟回憶指出，洪深坑此時栽種柑橘類果樹。參見洪敏麟口述，林金田、謝嘉梁訪問，劉澤民記錄，《文獻人生：洪敏麟先生訪問紀錄》（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0），頁 112。

⁸⁹ 有關洪元煌與洪火煉的關係，參見駒込武，〈抗日運動における教育要求と總督府の教育政策：1920-1930 年代台中州草屯庄の事例を中心に〉，頁 416-419。要言之，在與殖民政府的立場上，洪元煌是鮮明的抗日運動家，而洪火煉則依附於殖民政府。

⁹⁰ 〈洪育綸先生訪問紀錄〉。

以往有關吳萬成的史料，與洪元煌一樣，除了非武裝抗日運動時期頻仍的新聞報導之外，幾乎毫無相關文獻。然而，不幸中的大幸，1999年9月21日臺灣中部大地震後出土的「草屯文書」，留下兩本吳萬成親筆所寫的日記，亦即《昭和六年當用日記》與《更生 昭和十二年日記 向上の跡》。⁹¹ 兩本日記皆以日文書寫，分別寫於1931年和1937年，前者適逢臺灣人政治運動的轉換期，後者則是殖民地社會教化政策的關鍵性年代。換言之，雖只是兩年份的日記，且後者大部分都是空白，對當時一些重大事件的描述，或只為三言兩語的片語隻字，或少數幾篇的宏言大論，遠遠比不上林獻堂日記的份量；且吳萬成也不似林獻堂，在當時已享有絕大聲望和社會地位。但這絲毫無損兩本日記的價值，仍是研究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珍貴的第一手史料。以下的論述，將以吳萬成日記的內容為本，輔以當時新聞報導以及相關史料相互對照，諸如《臺灣民報》、《臺灣新民報》和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等，以具體呈現吳萬成的行動及其思想歷程。

吳萬成1902年出生於南投郡南投街半山，1919年南投公學校實業科畢業後就讀國語學校。然在校第三學年期間，因參與學潮而遭受校方「自宅謹慎」一年的處分，⁹² 1923年終於順利自該校畢業，並於同年4月被分發至草屯公學校擔任訓導之職；⁹³ 一直服務到1928年，為專心從事政治運動而辭掉教職，並移居臺中州大屯郡霧峰庄吳厝，全力投入臺灣民眾黨和日後臺灣地方自治聯盟等團體的相關活動。當1932年4月15日《臺灣新民報》在臺灣島內發行日刊的願望實現，吳萬成便正式轉任《臺灣新民報》記者。吳萬成從擔任訓導起，到轉任記者這10多年之間，成為洪元煌抗日運動的左右手，跟著洪元煌東征西討、南北奔波。中日戰爭爆發後，全臺實施燈火管制，吳萬成卻在1937年因違反燈火管制而遭到免職處分，一時間成為殖民政府眼中的高等遊民。1940年為謀新職，遂攜家帶眷遠渡重洋，前往中國本土廈門，讓年近花甲的洪元煌更添寂寥。

要言之，吳萬成從1920年代中期到1930年代之間，投注心力於臺灣島內的政治運動而成為岳父洪元煌的左右手，不僅積極參與草屯地域的炎峰青年會，也

⁹¹ 吳萬成留存的兩本日記分別為：《昭和六年當用日記》（東京・大阪：株式會社積善館，1930），以及《更生 昭和十二年日記 向上の跡》（京都：日本赤十字社京都支部，1936年11月）。草屯梁志忠先生所藏並提供，謹此致謝。

⁹²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藏，〈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學籍簿〉。

⁹³ 臺北師範學校創立三十周年紀念祝賀會編，《臺北師範學校卒業及修了者名簿》，頁108。

擔任全島性政治運動的旗手。吳萬成扮演的角色及其代表的意義，除了因為婚姻關係而成為草屯洪姓一族的新成員外，也因其後移居霧峰，加深並強化洪元煌與霧峰林獻堂的連結。洪元煌與吳萬成這對岳婿，可說既是親族也是同志。而且藉由這層關係，再次印證臺灣中部抗日運動人物地緣空間網絡（南投－草屯－霧峰－鹿港）的密切關聯，以及臺灣社會人際網絡的構成中，高學歷（學緣）成為培養下一代接班人選的重要依據；⁹⁴ 並藉由學緣網絡，跨越地緣、血緣的藩籬，替地域社會引進另一股新的動力。

（一）公學校訓導與雄辯的「弁士」：吳萬成

吳萬成任職草屯公學校的訓導不久，便成了洪元煌的左右手，先後擔任炎峰青年會和稻香村共榮會的幹部，並與洪姓親族其他成員，包括上述的洪深坑等年輕世代，形成洪元煌背後強大的支持力量。

1927年10月28日，炎峰青年會創立以來的第三次會員大會，除決議會長洪元煌留任，並選出洪深坑擔任副會長外，吳萬成與林野、吳啓成和洪周南則共同擔任學藝部幹部。當夜並舉辦文化演講會，在全場800多名民眾前，吳萬成以「臺灣家庭改造論」為題，發表演說。⁹⁵

同年，臺灣民眾黨成立，洪元煌被推選為核心幹部之一，吳萬成也被任命擔任民眾黨全臺巡迴演講會的「弁士（演講者）」之一。年底，炎峰青年會更成為民眾黨的南投支部，作為地域性政治活動的中繼站。隨後，吳萬成便與岳父洪元煌、洪右，以及同樣是民眾黨幹部的葉榮鐘等聯手，南征北討到全臺各地舉辦巡迴演講會；只要該黨各地方支部舉辦成立大會，便輪番上陣舉行政談演講會，對民眾實施另類的政治教育（參見附表二）。

⁹⁴ 臺灣派閥政治學者陳明通指出，戰後臺灣的「派系」在強化二元聯盟機制（dyadic alliance）中，「最常見的便是運用社會中的初級團體關係，包括：血親、姻親、地域、宗教祭祀圈等因出生而得來的關係。」其中非因出生得來的關係即是學緣。「同門學緣的關係，往往被類比成初級團體關係，具有同樣的約束力。」（陳明通，《派系政治與臺灣政治變遷》〔臺北：月旦出版社，1995〕，頁15。）有關戰前學緣網絡的研究，參見陳文松，〈臺灣近代學閥形成之原型：以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同窗會為中心〉，頁103-136。

⁹⁵ 〈地方通信草屯 草屯青年會總會〉，《臺灣民報》181，1927年11月6日，第6版。

1928年10月28日，民眾黨巡迴政談講演隊假草屯炎峰青年會館舉辦大型演講會，會場共聚集了1,500多名民眾聽講，可謂盛況空前。吳萬成負責致開會辭，但是當說到「國民要有政治常識才行」這句話之後，竟突然遭到現場監視的警察命令中止，隨後預計依序上台演講的講者也都被中途喊停，讓現場民眾群情激憤，雙方衝突一觸即發。最後，由洪元煌出面調解，才讓這場紛爭落幕。⁹⁶

其後，吳萬成被任命為民眾黨本部的專任書記（專職黨工）；為了專心從事政治運動，吳萬成辭去草屯公學校訓導一職。對此，當時的《臺灣民報》曾作如下的報導：

草屯洪元煌氏的佳婿元公學校訓導吳萬成君，素對社會運動抱有趣味所以這回特辭教職，而為臺灣民眾黨本部駐在書記，要專心活動，故地方的諸同志，欲獎勵如此有志的青年並祝其將來之奮鬥，故於十一月二十四日在炎峰青年會館開餞別會，是日參會有二十餘名頗呈盛況云。⁹⁷

如前所述，1930年之後，臺灣民眾黨再度陷入了分裂的危機。林獻堂等人宣告退黨，並於同年8月另組臺灣地方自治聯盟。洪元煌與吳萬成從自治聯盟籌劃之初便參與其中，但未主動辦理退黨手續，最後則被民眾黨決議除籍。同年12月，炎峰青年會遂改披臺灣地方自治聯盟南投支部的旗幟，重新出發。洪元煌、吳萬成和洪右等草屯炎峰青年會的核心人物，再度受命為臺灣地方自治聯盟本部（設在臺中）的講者，⁹⁸ 前往臺灣各地的聯盟支部成立大會站台，過著南北奔波的日子。⁹⁹

首先在1930年9月舉辦的高雄支部成立大會上，吳萬成和葉榮鐘等人擔任巡迴演講的講者，結果吳萬成的演講又再次受到中止的命令。對此，《臺灣新民報》的專欄〈高雄潮聲〉，除了對警察方面的作法不假辭色外，也提到當天發生問題的演講內容：

⁹⁶ 〈地方通信草屯 政談大演說會臨監官濫發中止〉，《臺灣民報》233，1928年11月4日，第6版。

⁹⁷ 〈地方通信草屯 開吳君餞別會〉，《臺灣民報》237，1928年12月2日，第6版。

⁹⁸ 葉榮鐘，《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下冊，頁513。

⁹⁹ 演講的盛況，可參見葉榮鐘，《臺灣人物群像》（臺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00）中「地方自治聯盟演講會」照片，同書照片頁。

本月十七日自治聯盟在市內開政談講演時，弁士吳萬成君講到臺灣假自治比做如彫塑佛像、只有金身、而無靈魂，後談這樣地方自治是有名無實的一節，竟被中止。某君憤慨說，這句話無論是新聞報道、或是口頭演說，誰也是常用的，怎樣要中止呢？真是無理的監督官了。¹⁰⁰

12月7日，自治聯盟南投支部的成立記念演講會在炎峰青年會館舉行，由自治聯盟本部的幹部和南投支部的幹部輪番上陣，舉辦了盛大的演講會。當天講者的名單和講題如下：

〔按：1930年12月7日 自治聯盟南投支部成立記念講演 炎峰青年會館〕

- 一 地方自治與民眾生活 洪元煌君
- 一 產業與自治 黃鴻源君
- 一 臺灣自治聯盟運動方略 葉榮鐘君
- 一 現行地方自治制度之一考察 吳萬成君
- 一 就臺灣州市議員模擬選舉而言 呂靈石君
- 一 地方自治之特色 張景源君¹⁰¹

各地支部其後陸續成立，因此光是在1931年的上半年，吳萬成即以本部巡迴演講員的身分，和其他地方自治聯盟的幹部等前後奔赴臺中州員林、南屯，臺南州北門、佳里，遠達屏東，以及臺北州臺北支部的成立大會，舉行一連串的政談講演會。¹⁰²除了上述題目外，還曾以諸如「地方自治與教育問題」、「現行制度施行後的臺灣農民」等為題開講，和洪元煌、葉榮鐘等人搭擋合作，以簡單易懂的方式，直接向全臺各地的民眾宣傳地方自治聯盟的理念。這樣的宣傳任務絕對不輕鬆。因為除了要面對敵對陣營——農業組合的鬧場和警察的臨監干涉之外，最大的挑戰乃因為南北奔波，常常必須不分日夜的移動，不僅是體力上的一大考

¹⁰⁰ 〈高雄潮聲〉，《臺灣新民報》332，1930年9月27日，第9版。

¹⁰¹ 〈地方通信草屯 聯盟支部成立開紀念講演〉，《臺灣新民報》343，1930年12月13日，第8版。

¹⁰² 參見當時《臺灣新民報》一連串的相關報導。例如〈地方自治聯盟 北門支部成立並開紀念演說會〉，《臺灣新民報》348，1931年1月24日，第2版；〈自治聯盟臺北支部發會式 祝辭祝電熱望真自治 決議宣言表示真決意〉，《臺灣新民報》366，1931年5月30日，第3版；〈自治聯盟 南屯支部大會 講演被濫發中止〉，《臺灣新民報》375，1931年8月1日，第4版等。

驗，沒有時間和家族團聚，更是像吳萬成這樣全力投入的政治運動家，內心最大的煎熬和無奈，而吳萬成的日記便是最鮮明且活生生的證據。吳萬成在 1931 年《昭和六年當用日記》，留下幾次類似的記載：¹⁰³

〔按：1931 年 1 月 12 日屏東支部、1 月 13 日臺南北門支部發會式〕

舊曆 11 月 24 日 新曆 1 月 12 日 晴天。

搭乘清晨五點十五分的火車前往屏東支部發會式。

夜晚有政談。當地人士的熱心讓我只有感動。

尤其是與內地人共同舉辦更是破紀錄。與學生時代所看到的屏東相較，現在所面對的屏東令我感觸特別深刻。

晚上的演講會中，原本以為會有農民組合的人來搗亂的，全程無事。楊肇嘉先生、葉榮鐘先生和上田雄太郎¹⁰⁴ 都以日語發表演講。¹⁰⁵

舊曆 11 月 25 日 新曆 1 月 13 日 晴。

搭乘上午十點的火車，由屏東出發前往臺南。

今天有北門支部的發會式。晚上在佳里座舉行政談。

被中止。演講會中所言內容儘管都四平八穩，但除了岳父以外全都被中止。搭十點半的包車前往臺南。於醉仙閣接受劉明哲先生的宴請招待。

清晨二點結束後一同夜宿赤崁園。

楊先生〔按：楊肇嘉〕因為要準備前往內地的關係而提早一步先回臺中。¹⁰⁶

¹⁰³ 為使讀者能自行參查史料原文，以下相關引文，皆附原文於注釋。

¹⁰⁴ 上田雄太郎與吳萬成、葉榮鐘等皆為臺灣地方自治聯盟地方巡迴政談演說會的主要「弁士」，且是其中唯一的日本人。而且當時「在各地講演會常有文協、農組及民眾黨旗下的工友總聯盟之搗亂、揶揄、騷擾無所不至。」參見葉榮鐘，《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下冊，頁 513。

¹⁰⁵ 原文：「午前五時十五分の列車にて屏東へ。屏東支部發會式あり。夜は政談あり。當地の人士の熱心は感心の外はない。殊に内地人の共催に於いて記録破りだ。學生時代に視たる屏東と現在みつがある屏東は故ら感が深い。夜の講演會にはさぞ農組の分子が邪まするだらうと思つたけれど、一途平安なり。楊肇嘉先生、葉榮鐘先生、上田雄太郎氏が國語にて演説あり。」

¹⁰⁶ 原文：「午前十時の列車にて屏東發 臺南へ。今日は北門支部の發會式。佳里座にて今夜は政講あり。中止された。講演會場は概して泰平なるも弁士は岳父を除く外悉く中止。十時半貸切にて臺南へ。醉仙閣にて劉明哲先生の招待宴あり。二時すぎ終わりて一同は赤崁園にて泊す。楊先生は内地へ行く準備ある為め一足先臺中へ帰る。」日記最後所記楊肇嘉的內地行，應指為向新任臺灣總督太田正弘進行地方自治的陳情，即林獻堂在日記中所記「十時肇嘉來自臺中，言明日之船，將上京會新總督，陳述地方自治之意見。」一事。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四）》，1931 年 1 月 18 日，頁 23；亦可參見葉榮鐘，《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下冊，頁 517。

由這連續兩天的日記可知，吳萬成等人從臺中的地方自治聯盟本部出發，趕赴南部兩個不同地方支部的成立大會，移動的路線如下：「臺中→屏東（夜）→臺南→北門→臺南（夜）→臺中」。這樣的行程，以現代的交通工具移動尚感匆促，更何況是當時。在緊湊的行程安排下，幾乎當時最現代的交通工具都派上用場了；從搭乘火車到租賃計程包車，才能在最短時間內完成連續兩個晚上的政談演講會行程。

而從日記的內容，也讓後人了解到當時的臺灣政治活動家，似乎很難同時兼顧家庭與事業，其間所付出的心力，實不足為外人道。吳萬成以下連續三天的日記，即讓我們得以窺探一二：

（1931年8月1日至3日）

舊曆6月18日 新曆8月1日 土曜。晴。

會面者＝番仔田的人士們。

前往處＝番仔田。

搭乘早班火車返鄉。太太帶著兒子鼎新（吳萬成的長男）回草屯娘家。

過了十點與太太商量的結果，搭乘下午二點多的火車回臺中。上午洪右兄來訪。馬上請古市醫師過來看診。鼎新的病情相當嚴重。¹⁰⁷

舊曆6月18日 新曆8月2日 日曜。臺北支部。南投支部。晴天。

會面者＝草屯的人士們、父親。

前往處：草屯。

早上父親來臺中。下午前往草屯。出席支部大會。

傍晚六點四十九分的車返回臺中。父親在本部留宿。

鼎新的病情依舊沒有好轉。¹⁰⁸

¹⁰⁷ 原文：「相會者＝番仔田の人々。往所＝番仔田。初列車にて帰郷。妻は鼎新をつれて草屯へ。十時すぎ妻帰り相談した結果午後二時すぎの汽車にて臺中へ。今朝洪右兄來訪。直ちに古市先生に診てもらった。病勢頗る重態。」

¹⁰⁸ 原文：「相會者＝草屯の人々。父。往所＝草屯。今朝父來中。午後草屯行き。支部大部【按：會】出席。午後六時四十九分にて帰中。父は本部にて泊す。鼎新の病勢相變らず弱からず。」

舊曆 6 月 20 日 新曆 8 月 3 日 月曜。晴天。

相會者＝三枝君〔按：陳三枝〕。

前往處：無。

由於孩子生病的關係，所以最近往往無法前往本部執勤。¹⁰⁹

從這些真情流露的記載可看出，吳萬成在從事政治活動與照顧家庭之間，遭逢難以兩全的困境；然而，吳萬成並未放棄政治活動。而從公開的新聞報導到私人的日記，更可感受到為了從事政治實踐、堅持臺灣人自治的理念，吳萬成不但辭去公學校教職，甚至犧牲照顧家人的時間；從中，也可看出他對岳父洪元煌長期參與的政治運動毫無吝惜的付出。這股對反殖民專制統治的政治狂熱並非盲目，實乃源自吳萬成蘊含內心、堅持的政治理念。

在全臺巡迴政談講演會中，吳萬成對於殖民統治下臺灣的偽自治，即以一般民眾淺顯易懂的比喻，如「彫塑佛像」且「有名無實」等進行批判。而從日記中，更可看出這些平常在演講中表露的「口語政治（政談）」，不但是有備而來，且更具深度和廣度。在 1931 年 2 月 24 日的日記，正是吳萬成因投入臺灣地方自治聯盟巡迴政談講演活動而四處奔波之時，吳萬成寫了一篇題為「臺灣人と自治（臺灣人與自治）」的長文。由於這篇長文有助了解當時臺灣人自治運動的內涵，以及具體呈現吳萬成個人政治理念，故以下特於此引用全文，讓讀者得以窺其全貌：

舊曆 1 月 8 日 新曆 2 月 24 日 火曜。

臺灣人與自治

臺灣人要求自治，臺灣政府〔按：臺灣總督府，以下同。〕言時期尚早。如果要求自治的臺灣人是不當的話，那麼言時期尚早而不予實行的政府則是無謀。自治是立憲國家政治的根本也是基礎，這是萬人均能同意之處。日本是立憲國家，但若不讓臺灣以此基礎實行自治的話，臺灣政府就是無法辨明立憲政治真隨的為政者。話說，雖然臺灣人在政治上受到的訓練仍不足，但是臺灣人的自治精神在領臺前，亦即前清時代便已養成。僅因制度不良之故而讓臺灣人在政治方面產生一些缺陷，令人感到遺憾。

¹⁰⁹ 原文：「相會者＝三枝君。往所＝別にない。子供の病氣故本部への出勤と不十分なり。」

日本統治臺灣之際，以軍隊和警察進行全面的壓制與干涉，於是也破壞了臺灣人的自治訓練的習慣。過去和現在的臺灣是警察的天下，而所有的自治諸團體淪為老舊官吏的收容所。若讓今日制度繼續存在的話，恐怕在將來更是成為諷刺。

因此，臺灣的為政者只見一黨之私而不顧及帝國發展的百年大業，尋找種種藉口而置四百萬島民於不顧。本來日本人就是因為島國根性，完全不輸給源賴朝般那樣具有深厚的猜疑心，特別是居住在臺灣的母國人大半抱持著警察根性，於是內臺人之間才常常出現隔閡。

若真是為帝國前途著想的為政者的話，就在臺灣實行真正的完全的自治制度，讓臺灣人進行自治訓練才是賢明的。發布偽裝的自治制度以來已十年，臺灣人起碼在這十年間也有些研究心得才對，今日若還討論現行制度的優劣就是愚昧至極了。執著於這個一無是處的現行制度，即等同於在臺灣實行專制政治。¹¹⁰（底線為筆者所加）

在這篇長文中，吳萬成首先指出，殖民政府當局（為政者）以時期尚早論，反對臺灣實行自治，此乃違反日本本土立憲國政治的基本精神。他也批判那些主張時期尚早論的臺灣總督府官僚，只是為了「一黨之私（一郷一黨の利害）」完全不顧

¹¹⁰ 書寫於《昭和六年當用日記》，2月24-26日。原文：「臺灣人が自治を要求してゐる。臺灣政府は時期尚早だと言つてゐる。自治を要求する臺灣人は不當ならば時期尚早とて与へない政府は無謀である。自治は立憲國政治の根本であり基礎であることは萬人均しく認むる所である。日本は立憲國であるあ（ママ）らばこの基礎的たる自治を臺灣に施行し得らなければ正しく臺灣政府は立憲政治の真髓を辨へない為政者である。成程臺灣人は政治的訓練が足りないが併し臺灣人の自治精神は領臺前即ち前清時代からすでに養成して來てゐる。ただ制度が悪かつた為めに臺灣人が政治的方面に多少欠陥を生じて來たのは遺憾に思ふ。日本が臺灣を統治するに當り軍隊と警察を以つて悉く威圧と干涉をした為めに臺灣人の自治的訓練の習慣を破壊せしめたわけである。過去と現在では臺灣は警察の天地でありすべての自治團體の諸機關は老朽官吏の收容所となつてゐた。現制度の存在する以上恐らく將來はもっと皮肉（ママ）なるだらう。そこから臺灣の為政者は一郷一黨の利害を見て帝國百年の大計を思はないものばかりであるから種々の口實をつけて四百萬の島民を顧みない。元來日本人は島國根性であるからすべてが源賴朝に負けない猜疑心が厚い殊に臺灣在住の母國人の多くは警察根性が帯びてゐるから内臺人間常に間隔が生じてゐる嫌がある。真に帝國の前途を思ふ為政者ならば臺灣に真なる完全なる自治制を施行して臺灣人に自治訓練をさせるのは賢明だと信ずる。仮装的自治制を布られて十星霜 臺灣人は少くともこの十星霜研究して來た筈である。今尚現制度の善惡を論ずるは愚の骨頂だ。この無用の長物たる現制度を固執することは臺灣に專制政治を行ふのと同様である。」

及「帝國發展的百年大業（帝國百年の大計）」。¹¹⁰第二，吳萬成認為臺灣人自受清朝統治以來，便已具有自治精神，所以臺灣人從以前便有自治的傳統。他同時認為內臺人之間產生隔閡的原因，乃在於「居住在臺灣的母國人大半抱持著警察根性」，猜疑心重所致。第三，吳萬成強烈批判殖民政府施行由軍隊和警察等構築而成的警察政治，此乃是破壞臺灣人自治傳統的元兇。最後，吳萬成呼籲只有在臺灣實施「完全的自治」，才是真正符合帝國利益的作法；相反的，若依舊施行「偽裝的自治」，不但違反立憲政治的精髓，更是完完全全的專制政治。從頭到尾，都可看出吳萬成對殖民政府當局的專制政治，所進行的歷史性政治批判。

除了日記，在公開場合，吳萬成的筆鋒也不曾變調。1931年，臺灣唯一的合法政黨臺灣民眾黨，遭受殖民政府解散，《臺灣新民報》特別開設〈紙上議會〉的版面，並且以「臺灣民眾黨雖遭禁，但為了追求臺灣人的政治自由，今後是否也必須組織合法的政黨？又今後必須怎麼做？」¹¹¹當作「議案」，希望藉此喚起輿論的討論，而公開募集讀者投書。吳萬成在公開投書中，不僅呼應同報所登洪元煌的主張，¹¹²更認為組織合法的政黨乃絕對必要。文中，吳萬成主要由臺灣人實施政治訓練和政治教育的必要性出發，而強烈主張組織合法政黨的必要性。他更進一步認為，臺灣人的分裂，乃是由於臺灣總督府採行的分裂政策使然；而且，正是為了不讓臺灣人掉入殖民政府分化政策之「奸計」，也有必要組織政黨。¹¹³

吳萬成在自治理論的開展上，並非僅僅針對臺灣全島性的議題發言，對於地域社會層級的地方自治，也是砲火全開，公開與殖民政府展開全面性的對決。除了寫下對草屯新舊組合合併問題的看法外，¹¹⁴1931年發生的南投街金子街長因挪用公款問題被揭發而自殺一事，吳萬成也以專文發表評論，認為此問題的癥結，主要在於官吏任用不當所致，而容許這種情況發生的南投街民也有責任。為防止同樣問題再次發生，吳萬成呼籲殖民政府必須尊重民意，而街民則必須自

¹¹¹ 原文：「臺灣民眾黨は禁止されたが臺灣人の政治的自由を獲得するために、今後も合法的の政黨を作るべきか否か。將又どうすべきか。」〈紙上議會〉，《臺灣新民報》357，1931年3月28日，第15版。

¹¹² 有關洪元煌的主張，請參見陳文松，〈洪元煌の抗日思想：ある「台湾青年」の活動と漢詩〉，頁80-81。

¹¹³ 〈紙上議會 臺中吳萬成〉，《臺灣新民報》358，1931年4月4日，第15版。

¹¹⁴ 〈草屯新舊兩信組當事者に與ふ〉，《昭和六年當用日記》，8月7-11日。

覺。¹¹⁵ 吳萬成在這篇標明於 1931 年 4 月 22 日撰寫的長文中，對於殖民地官吏任用不當的批判，與同年 2 月 24 日的日記所述殖民政府對於新官僚的任命，讓各地方「所有的自治諸團體淪為老舊官吏的收容所」的批判如出一轍。換言之，藉由新南投街長的任命問題，吳萬成健筆一揮，一方面提出住民意志的重要性，並且公開批判完全無視住民意志的官僚政治；另一方面，則敦促住民進行反省，警告殖民政府當局不要再漠視住民的存在。

綜合以上所述，作為政治運動家的吳萬成，在政治理論的訴求和理念上，是一位對殖民統治具有系統性和理論性批判能力的人物。而且，不管是在理論上，抑或是在現實的政治活動中，都能全方位地訴諸於臺灣人自治的正當性，成為反殖民統治運動後期，最令當局頭痛的人物之一。吳萬成的思考脈絡，遠可溯及 1920 年前後，林獻堂、洪元煌等人創設領導的東京新民會和臺灣文化協會，其間並歷經 1920 年代初期創刊的《臺灣青年》、《臺灣》和《臺灣民報》，直到《臺灣新民報》發行日刊為止。相較於 1920 年代中期以後，左、右派的分裂導致「臺灣青年」第一世代的分裂（如王敏川投入左派陣營），且右派成為左派各陣營（如農民組合）眾矢之的，吳萬成的主張不但與分裂前聯合陣線所積極鼓吹力行的「臺灣人自治論」一致，且能以更貼近民眾的語言，直接對準殖民政府專制統治的痛處。因此，吳萬成可說傳承上一世代，且堪稱是第二代「臺灣青年」中，最活躍的「臺灣人自治論」代表性人物之一。

（二）從記者淪為「高等遊民」的吳萬成

從公學校訓導到政治運動家的吳萬成，隨 1932 年 4 月《臺灣新民報》長年努力爭取的目標——發行日刊，因獲殖民政府許可而擴大編制，而得以在洪元煌和林獻堂的推薦下，成為該報的記者。¹¹⁶ 但原來可因此一展所長的職務，卻因滿州事變爆發，臺灣軍部不斷對這份全臺唯一由臺灣人創辦的報紙，強化對該報言論的干涉和鎮壓，使如願任職日刊《臺灣新民報》的吳萬成，反而無法揮動如

¹¹⁵ 吳萬成，〈南投街民に寄す 街長は淹はれる黴菌は繁殖する〉，《臺灣新民報》363，1931 年 5 月 9 日，第 15 版。另可參見吳萬成，〈地方通信南投 街長已自殺 會計豈無責〉、〈南投街長の死 何がさうさせたか 責任感何処にある〉，《臺灣新民報》357，1931 年 3 月 28 日，第 9 版、第 15 版。

¹¹⁶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五）》，1932 年 1 月 24 日，頁 42。

椽之筆，自由自在地提倡臺灣人自治和批判殖民政府當局了。到了皇民化運動時期，更在當局的要求下，必須配合協助社會教化活動的宣傳工作。1937年的《更生 昭和十二年日記 向上の跡》中，吳萬成留下最多的日記內容，便是頻頻記錄寥寥數語的活動摘要，包括參加州下優秀連合保甲壯丁團檢閱、男女青年團研究會、部落振興會研究會，以及紅十字少年團結團式等各種各樣社會教化的相關官方活動採訪。¹¹⁷

同年（1937）3月，對吳萬成而言，可能是一生中最低潮的時期。事件的緣起，在推薦吳萬成進入《臺灣新民報》的林獻堂日記中，也有簡明扼要的記載：

新3月19日 舊2月7日 金曜日 晴／雨 六十八度

洪元煌之女婿吳萬成亦因酒醉於九日夜間不受灯火管制之約束，被羅專務免職。¹¹⁸

而在吳萬成所寫的日記中，對於這次事件發生的前因後果，更有詳細的交代：

舊曆1月27日 新曆3月9日 火曜

在莊遂性〔按：林莊生之父〕家中與許發、張聘三兩人聚餐。

飯後又到小吃店（黑輪屋）喝酒。

這天是燈火管制日，但因在醉醺醺的情況下於分局前點火柴之故，被帶往楊町派出所。果然¹¹⁹引發嚴重後果而亂成一團。沒多久便被釋放並前往中和館稍歇後返家。

錫恩〔按：洪元煌長男〕從內地回到臺中。¹²⁰

¹¹⁷ 吳萬成，《更生 昭和十二年日記 向上の跡》，2月份。

¹¹⁸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九）》，1937年3月19日，頁105。

¹¹⁹ 此處「果然」一語，實與當時臺灣軍部已將臺灣新民報視為眼中釘密不可分。而從吳萬成違反燈火管制到提出辭呈不到一星期的快速處理，更可想見臺灣新民報高層雅不願讓此事成為臺灣軍部壓制該報之藉口。當時，尚有林獻堂族人遭密報擁有槍械一案而暗指林獻堂涉案，可見包括吳萬成本人在內，對此次事件都有相當覺悟。此點，承蒙業師若林正文於筆者2011年6月5日於日本京都「同志社大學DOS C+國立成功大學大學共同ワークショップ」發表〈日治時期臺灣社會「跨語學歷菁英世代」及其政治實踐：以洪元煌的乘龍快婿兼左右手吳萬成為例〉一文擔任評論人時，惠予教示，謹此致謝。

¹²⁰ 原文：「莊遂性氏宅ニテ許發、張聘三兩氏と會食會食後オデンヤにて飲む。燈火管制日で酔いまざれに支局前にてマッチつけたことに依り楊町派出所につき行きぬ。果然問題惹起デマが乱れとぶ。直ちに釈放され中和館にて少憩して帰宅。錫恩が内地より帰中。」

舊曆 1 月 28 日 新曆 3 月 10 日 水曜

一大早太太來臺中。

上午十點左右岳父、洪朝東君來訪。

對於昨晚被帶往警察局的過錯表達歉意。

下午五點左右和岳父等人回到番仔田。

晚上被岳父狠狠地教訓了一頓。洪右、洪水牛兩君來訪。

發誓從今天起絕不再喝酒。¹²¹

舊曆 1 月 29 日 新曆 3 月 11 日 木曜

一整天都在家中以示自省。

羅萬俾專務寄來一封給岳父的書信。

信中表達希望我自己主動提出辭呈，這讓全家族感到很狼狽。

隨即商討如何善後之策。

認為應該拜託洪銘水代為出面交涉。¹²²

舊曆 2 月 2 日 新曆 3 月 14 日 日曜

提出辭呈（透過陳萬轉交）¹²³（底線為筆者所加）

痛失記者一職的吳萬成，成為殖民政府眼中的「高等遊民」，最後終於在 1940 年 2 月舉家遷往廈門。如此一來，讓岳父洪元煌失去了長期以來從事政治運動的左右手，更面臨和親人的離散。這種老後的孤獨感，在洪元煌的「送萬成女婿允兒攜家西渡廈門就職」漢詩中，完全表露無遺。詩作中的文句，直言「當時苦不聽吾言 作客方知海外難 受諫君無今日事 原來世味總辛酸」、「遠泛銀河附客舟 此行豈是等閒遊 臥薪嚐膽從今始 事志無成兩不休」。對即將西渡的女婿，內心夾雜著悔恨與勉勵的情懷，其悲傷可想而知。¹²⁴

¹²¹ 原文：「早朝より妻來中。午前十時頃岳父、朝東君來訪。警察署に行つて昨夜ノ非を詫びる。午後五時頃岳父等と共に番仔田へ歸る。夜は岳父より一大訓戒を喰い。洪右、水牛兩君來訪。本日より絶対禁酒を誓約した。」

¹²² 原文：「一日中自宅にて謹慎ノ意を表ス。羅專務ヨリ岳父ニ當テル書信來ル。自發的辭表ヲ提出セヨノ意デ一家族ハ大狼狽。直ちに善後策講□。洪銘水氏ニ煩して交渉すべき件を頼む。」

¹²³ 原文：「辭表提出（陳萬ノ手ヲ經テ）。」

¹²⁴ 〈送萬成女婿允兒攜家西渡廈門就職〉，收於洪元煌，《雪峰詩集》（手稿，草屯梁志忠先生所藏並提供，

總之，如上所述，吳萬成不只在草屯和南投兩地，甚至在臺灣全島追求臺灣人自治的政治運動中，均發揮其雙語能力，手口並用盡情地開展其臺灣人自治的理論。觀其活動的獨特性，在於活用殖民地學校所學和任職公學校的經驗，除了批判殖民地教育外，¹²⁵ 更從歷史與實際經驗，嚴詞批判臺灣殖民政府宣稱的臺灣人自治尚早論。「臺灣人與自治」為題的日記和他的演說內容，正是其政治理念和政治實踐的具體展現。然而，1930年代中期以後，臺灣人言論機關受到臺灣軍部的強力監視和鎮壓，吳萬成雖然身為記者卻無法伸展其志，過著每天以報導和採訪官方主辦的各式社會教化宣傳活動度日。到了1937年，終因酒後苦悶而不慎違反當局實施的燈火管制，遭到解職。變成了「高等遊民」的他，最後更不得不離鄉背井，西渡中土。

五、結論：

雙語學歷菁英殖民政治參與的多元樣貌

綜合以上所論臺灣中部草屯地域洪姓一族三位成員的事例，我們對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臺灣雙語學歷菁英——殖民地青年的多元樣貌（參見附表一），得有更清晰的描繪，並可歸納以下幾點結論：

第一，本文所舉三位國語學校畢業的雙語學歷菁英世代——洪清江、洪深坑和吳萬成，在日本殖民統治政策中，肩負著共同協助新領土經營的任務。以公學校教師的身分，不論是在學校抑或地域社會，皆扮演將臺灣人教化成所謂「忠良的日本國民」¹²⁶ 的角色。然而，在殖民統治體制中，他們不過充當「輔助者」角色，必須接受其上級，即校長和地方官廳長官的指揮；而這些上級長官不像中

謹此致謝。)，第40首。

「有父無處可銷售	決意攜家入鷺洲	莫道他鄉生計拙	窮通禍福半人謀
團圓無計奈愁何	八口飄零別恨多	此去思明州上住	江湖滿地慎風波
老後何堪更寂寥	滿懷愁思向誰捎	早知世上情如水	悔不當年學折腰
家中父母弱難支	非是行人得意時	美麗河山雖好住	莫辭忙碌寄鄉書
當時苦不聽吾言	作客方知海外難	受諫君無今日事	原來世味總辛酸
遠泛銀河附客舟	此行豈是等閒遊	臥薪嚐膽從今始	事志無成兩不休」

¹²⁵ 吳萬成，〈南投郡教育當局に希望す〉，《臺灣新民報》306，1930年3月29日，第11版。

¹²⁶ 許佩賢稱之為「少國民」。參見許佩賢，〈塑造殖民地少國民：日據時期臺灣公學校教科書之分析〉（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暨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

央層級高等官僚多半來自東京帝大，¹²⁷ 往往是同樣畢業於國語學校的內地人校友。如洪清江，即使晉升至地方行政官廳的助役，也只能在曾任校長的渥美寬藏庄長之下擔任輔助角色。誠然，在日治時期當上庄長的國語學校臺灣人校友並不是沒有（如黃洪炎即曾任中寮庄庄長），然而就算當上一庄之長，還是要聽命於郡守。換言之，在殖民體制之下，雖然臺灣人「任官」的管道並非完全絕緣，卻愈往上爬，門就愈窄。甚至如吳萬成所言，地方行政機關已成日本人官吏退休後的收容所。¹²⁸ 不只如此，在地域社會中與民眾關係密切的公學校亦然。在日本帝國敗戰前夕，草屯地域才出現一位臺灣人校友出任校長一職，此外全由內地人校友和內地師範學校出身的內地人所壟斷。¹²⁹

第二，儘管重要職位皆為內地人所壟斷，但殖民政策的推動和相關行政業務在地域社會的落實，這些雙語世代殖民地青年，卻又是地方官廳不可或缺的人物。從本文論證可知，這些殖民地青年大部分在擔任訓導一職後，或轉任地方行政官僚體系中的助役、街庄役場相關職務，抑或到與地方產業資本密切相關的組合任職，或任內地大企業的職員（如糖廠原料委員等）。因此，從公學校到街庄役場，從教育到產業，協助內地人的校長、庄長、街長和內地企業主等，讓殖民政策能順利在地域社會落地生根。但從洪清江與洪深坑的事例可知，這些地域社會的「青年」仍可藉由「公職」身分，長期從事協助或掩護洪元煌推動的反殖民專制統治、臺灣人自治運動，以及支持地域社會的自主性近代化。

第三，這些殖民地青年，尤其是擔任公學校教師的臺灣人，雖然在殖民統治體制與殖民政策中，只是扮演「補助者」角色；不過，他們仍可在地域社會中充分發揮「領導者」功能。從草屯地域社會的傳統來看，這些殖民地青年多屬四大姓舊鄉紳階層的新生代，是自幼受過傳統書房教育、漢文教育與近代殖民地學校教育，具有漢文與國（日）語「雙重語言讀寫能力」的雙語學歷菁英。所以，對於地域社會的住民而言，他們的地位猶如往昔科舉時代的秀才，受到一般人的尊

¹²⁷ 參見岡本真希子，《殖民地官僚の政治史：朝鮮・台湾總督府と帝国日本》，頁 410-447。

¹²⁸ 個中原由，弘谷多喜夫在其論文中有生動的分析。尤其 1920 年地方制度改正，公學校內地人校長退休後接任庄長、街長，或擔任各種團體的顧問等，更成為通則。弘谷多喜夫，〈殖民地教育と日本人教師〉，頁 379。

¹²⁹ 國語學校畢業生陳啟三，1944 年 4 月至 1945 年 12 月間曾出任雙冬國民學校校長一職，這也是殖民地時期草屯地域唯一的臺灣人校長。參見洪敏麟總編輯，《草屯鎮誌》，頁 620-623。

崇，地域社會住民可藉由他們一起構築抵抗殖民統治的防線。另一方面，舊鄉紳階層則能透過這些雙語學歷菁英所具有的學緣網絡，延續家族的社會地位，或強化與殖民統治者「對話／對抗」的能力。這些雙語學歷菁英亦可藉此學緣網絡，跨越地域、血緣和殖民政策的藩籬，獲得更大的揮灑空間。這從本文分析的洪姓一族三位不同的成員即可一窺端倪，尤其是洪深坑和吳萬成，這些「草屯女婿」的貢獻，絲毫不遜於其他洪姓同族或草屯四大姓的年輕世代。

第四，這些雙語世代的殖民地青年，決非僅是單純地從屬於殖民政策抑或地域社會傳統，在追求提升臺灣人文化、地位，以及生活改善過程中，他們更是主動且全心全力投注於傳授住民有關漢文、國語（日文）、法律和農業改良等各方面的近代知識與技術。儘管有時在立場上或作法上像是配合殖民政府所採行的「同化」政策，卻不能因此便認為他們放棄了臺灣人的自治傳統。毋寧說，他們正利用從殖民地教育習得的雙重語言讀寫能力，積極善用和引進近代文明知識，擺盪於殖民統治體制與延續臺灣人自治的兩端，也不為過。參加臺灣文化協會的助役洪清江，與抗日運動領導者洪元煌攜手，不辭辛勞積極投入炎峰青年會農村近代化事業的公學校訓導洪深坑，以及兼具臺灣人自治理論與勇於實踐的洪元煌左右手吳萬成，儘管三者參與反殖民專制統治的程度或深或淺或明或暗，卻都有一項共同的特色，就是對臺灣人自治傳統的維繫，以及地域社會近代化追求。因此，他們所扮演的角色，不能以單純的「抗日」或「協力」分類基準來看待。相較於那些鮮明的「抗日」或「協力」人物，他們的角色通常更為艱難。而從結果來看，他們的境遇也不盡相同。例如，未公開與殖民政府當局對抗的洪清江、洪深坑，在戰爭時期仍得以在官製信用組合內職司要職；不惜辭去教職，全身投入反殖民專制統治陣營的吳萬成，最後卻淪落成「高等遊民」，無法容身於臺灣社會，而不得不攜眷西渡中土。

戰後，1946年時任草屯鎮長的洪元煌，在發給里民的電報公文中，呼籲里民應如期召開里民大會，因為「夫里乃地方自治之基本」，¹³⁰而吳萬成所在的新豐

¹³⁰ 「事由 電希如其召開里民大會由 草屯鎮公所代電 草總字第二七六五號 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九日」，臺北市二二八紀念館藏，「戰後臺中縣南投區署草屯鎮地方行政文書資料（暫稱）」（1946-1947年），No.011856。詳見陳文松，〈植民地支配と「青年」：台湾總督府の「青年」教化政策と地域社会の変容〉，頁314-315。

里（里長洪右）也積極響應。然而，不久後隨著二二八事件的發生，臺灣人自治的理念再度化為泡影，此為後話。

最後，針對本文所討論的三位地域社會雙語學歷菁英的殖民地經驗——同時包括與抗日運動領袖洪元煌以及殖民政策間的關係（參見附表一），簡單整理如下：首先，三者皆為國語學校畢業的臺灣人教師。其次，與同地域洪元煌所領導政治運動的關係，雖然皆屬洪氏一族，但支持與參與「政治性」運動的程度，深淺不一；反之，與遂行殖民政策的統治者之間的關係，亦是如此。第三，就世代而言，洪清江與洪元煌同出身於乙未割臺以前的草屯四大姓之一，在政權轉移過程中，四大姓（尤其洪李二姓）成為殖民當局極力拉攏和培育的對象。相較於洪元煌公學校畢業後即辭掉公職自組詩社，洪清江則因投身國語教育而逐漸走向體制內，受到統治者的高度重用，歷任區長、助役等公職，而與殖民統治者亦步亦趨。因此，洪清江對 1920 年代洪元煌率領的非武裝抗日運動，雖有參與卻屬消極，僅穩健地參與文化和教育層面。至於洪深坑與吳萬成，皆出生於乙未割臺後，未經戰亂且不像洪清江出身大族，而是以中下階層的子弟，藉由高學歷而與鄰近大族聯姻，並在教師一職的生活保障下，呈現「進可攻，退可守」的格局。洪深坑雖始終在「學校體制內」，但仍積極參與高度政治性的炎峰青年會，較「庄政體制內」的洪清江前衛；更於批判「庄政」之餘，投入改善庄政的社會教育和農事改良事業。而辭去教師一職的保護傘，公然投入抗日政治運動的吳萬成，則又是另一種典型。不僅在國語學校就學期間便參與 1920 年代初期的學潮，在辭去教職後，更與岳父洪元煌分進合擊，對殖民專制統治砲火全開，從「庄政」到「島政」，極力衝撞殖民體制的限制，可惜最後仍功敗垂成。而值得一提的是，穩健消極的洪清江從戰前到戰後，子女教育都非常成功，高學歷且留學、學醫者不在少數；¹³¹而穩健積極的洪深坑和退出體制外積極從事政治運動的吳萬成，子女多屬中等學歷，戰後亦僅停留在地方行政體制中的鄉鎮層級或水利系統幹部。此與體制內、外「政治參與」程度的深淺是否有直接影響，亦值得進一步研究。

¹³¹ 「今其內外子孫習醫者逾三十餘人，遍佈於海內外懸壺濟世」，其長子洪耀勳為東京帝國大學哲學博士。參見洪敏麟總編輯，《草屯鎮誌》，頁 935。

總之，從本文分析可知，從殖民政策與地域社會的角度來看，雙語世代殖民地青年的政治參與，經常處在一種「殖民地體制」與「臺灣人社會」、「中央」與「地方」、「(殖民統治)輔助者」與「地域社會領導者(對當地住民推動教育·教化工作)」，以及「近代文明／殖民地近代／從屬性近代化)的代理人」與「傳統文化／地域社會自治傳統／主體性近代化)的守護與媒介者」之間；其不斷被來自兩端的力量所拉扯而吃力不討好的角色，樣貌不僅多元且多重，難以驟然二分。

附表一 洪清江、洪深坑、吳萬成三人
與洪元煌、殖民政府之關係暨政治實踐類型分析

姓名	洪元煌	洪清江	洪深坑	吳萬成
生卒年	1883-1958	1881-1964	1897-1941	1902-?
出生地	北投堡番子田(今南投縣草屯鎮)	北投堡番子田(今南投縣草屯鎮)	貓羅堡同安寮(今彰化縣芬園鄉)	南投街半山(今南投縣南投市)
與洪元煌之關係	和蒼公派下,父清末北投保總理武秀才洪玉麟。	同宗。同屬和蒼公派下,同輩。父洪正泰,兄清末文秀才洪獻章。保護者洪玉麟。	姻親關係。生父褚匏,養父洪獻章。原姓褚,1919年婚姻入籍改姓洪。	洪元煌之女婿。父吳蒜。
與殖民政府之關係	草鞋墩公學校畢(1902)	草鞋墩公學校肄(1903)	社口公學校畢(1912)、臺中公學校實業科(1914)、彰化公學校實業科(1915)	南投公學校畢(1917)、同校實業科畢(1919)
	臺灣臨時土地調查局雇(1902),同年辭去該職。	師範部乙科(1906年畢)	公學師範部乙科(1919年畢)	公學師範部乙科(1923年畢)
	創辦碧山吟社(約1907-1913)	草鞋墩公學校等校訓導(1906-1915)	新庄公學校訓導(1920-1934)	草屯公學校訓導(1923)
	茄荖媽助圳主事(1915.10-)	碧山吟社(約1907-1913)	新庄青年團長(1923.3.11)	炎峰青年會學藝部委員(1927)
	草鞋墩信用組合監事(1916-1928)、理事(1928-1931)	新庄區長(1915.9-1920)獲頒紳章(1920)	全島青年團指導者講習會會員(1928)	番子田(稻香村)共榮會(1928)
	東京新民會員(1919)	草屯庄助役(1920-1936)	炎峰青年會副會長(1927)	臺灣民眾黨本部書記及巡迴弁士(1927)
	草屯庄協議會員(1920-1924)	臺灣文化協會理事(1927退出)	番子田(稻香村)共榮會國語科講師(1928)	臺灣地方自治聯盟巡迴弁士(1930)
	臺灣文化協會理事(1921-1927)	炎峰青年會(1924-)	南投郡青年團幹部講習會(1932)	臺灣新民報記者(1932-1937)
	臺灣民報社監察役(1923.7-)、臺灣新民報社相談役(1929.3-)	玉峰俱樂部(1927)	草鞋墩信用組合(舊組合,1936止)	高等遊民,西渡中土。(1940)
	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第五回上京代表之一(1924),行前辭去草屯庄協議會員一職。	番子田(稻香村)共榮會國語科講師(1928)	草屯信用購買販賣利用組合(新組合,1933)	

	創設炎峰青年會 (1924.10)	草屯信用購買販賣利 用組合(新組合常任理 事, 1937.6-)		
	臺灣民眾黨常務委 員、社會部主任(1927-)	草屯街民選協議會員 (1937.12-)		
	臺灣地方自治聯盟理 事(1930-)	南投郡部落振興會教 化委員(1937)	南投郡部落振興會教 化委員(1937)	
	草屯保甲聯合會長 (1916.8-)			
	草屯信用購買販賣利 用組合常任監事 (1936.7-)			
	臺中州會議員 (1936.11-)			
	臺中州民飛行機獻納 委員			
	皇民奉公會臺中州支 部奉公委員(1942-)			
戰後	官派第二屆草屯鎮長 (1946-), 樸社社員 (1947)。	「畢生致力教育, 不 分男女親疏遠近, 皆 勉人力學」(《草屯鎮 誌》, 頁 934)		新豐里里民代表 (1946)
對殖民統 治的態度	「退出體制外」, 不分 島內、外, 「島政、庄 政, 砲火威猛, 無役 不與」。	「庄政體制內」, 「亦 步亦趨, 知難而退」。	「學校體制內」, 「批 判與改良庄政兼 具」。	「退出體制外」, 「庄 政、島政, 砲火全 開」。
政治實踐 之類型	陣地戰大砲型	穩健而消極型	穩健而積極型	衝鋒陷陣型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臺灣民報》、《臺灣新民報》、《草屯鎮誌》、《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學籍簿》，以及《灌園先生日記》等製表而成。

附表二 草屯炎峰青年會洪元煌、吳萬成「翁婿」所參與之活動
暨演講題目一覽（1924-1931）

時間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與演講題目
1924年10月28日	草屯炎峰青年會設立大會	會員演說、來賓演說、各地祝電、以及演出文化劇「辜狗變相 改良書房」。
1925年6月1日～	炎峰青年會巡迴講演	洪元煌、李烏棕、林野、李春喙、吳啟成、洪獻章、李春盛、洪清江、洪獻奎、洪應用等。
1926年3月	草屯炎峰青年會演劇團	南投郡竹山庄開演
1928年8月25日	草屯稻香村共榮會衛生講話會	洪廷基開會詞、鄭傳對「農村衛生」、吳萬成「兒童之教育」、洪右閉會。
1928年10月28日	臺灣民眾黨草屯政談講演會、炎峰青年會館	吳萬成「臺灣家庭改造論」、洪元煌。
同上	炎峰青年會總會、同青年會館	吳萬成、洪元煌。
1930年8月	臺灣地方自治聯盟紀念講演	洪元煌「地方自治與民眾生活」
1930年9月	臺灣地方自治聯盟支部全島巡迴講演	吳萬成、葉榮鐘等。
1930年12月7日	臺灣地方自治聯盟南投支部成立記念講演、炎峰青年會館	洪元煌「地方自治與民眾生活」、黃鴻源「產業與自治」、吳萬成「現行地方自治制度之一考察」、呂靈石「就臺灣州市議員模擬選舉而言」、張景源「地方自治之特色」。
1930年12月11日	臺灣地方自治聯盟南投支部、南投街悅舞台	洪元煌、曾金泉、賴遠輝、張景源、葉榮鐘。
1931年1月13日	臺灣地方自治聯盟北門支部成立	吳萬成「地方自治與教育問題」、葉榮鐘「臺灣地方自治聯盟運動方略」、洪元煌「地方自治與民眾生活」。
1931年3月25日	臺灣地方自治聯盟、民雄庄大士爺廟政談講演會	葉榮鐘「立憲政治與地方自治」、吳萬成「現行地方自治制度之一考察」、賴遠輝「地方自治制之運用」、洪元煌「地方自治與民眾生活」。
1931年5月	臺灣地方自治聯盟臺北支部發會式	吳萬成「地方自治與教育問題」
1931年5月17日	炎峰青年會改組總會、夜晚紀念政談講演會、炎峰青年會館	林野開會辭、蔡先於「立憲政治與地方自治」、洪右「人生與政治」、楊肇嘉「第五十九議會與臺灣問題」、洪元煌「現行制度和草屯庄政」（洪右、洪元煌被中止）。

1931年7月13日	炎峰青年會開紀念講演、炎峰青年會館	洪應用、洪欽堯、吳萬成。
1931年7月18日	臺灣地方自治聯盟臺中支部大會	議長洪元煌
1931年7月25日	臺灣地方自治聯盟臺南州北門支部大會	洪元煌與會
1931年8月1日	臺灣地方自治聯盟南屯支部大會	林清雲開會詞、吳萬成「現行制度施行後的臺灣農民」、蔡先於「立憲政治與地方自治」、楊肇嘉「地方自治是立憲政治下當然的權利」、張景源「地方自治之特色」、洪元煌「十年來之政治的消長」、林友仁閉會。
1931年8月2日	臺灣地方自治聯盟南投支部第一回大會、炎峰青年會館	議長洪元煌、參與吳萬成等。
1931年10月25日	草屯庄民大會（解散）	洪元煌、吳萬成、洪右、洪錦水其他。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臺灣民報》、《臺灣新民報》等製表而成。

引用書目

- 洪元煌，《雪峰詩集》（手稿），1940-1942年。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藏，〈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學籍簿〉。
陳文松訪問記錄，〈洪育綸先生訪問紀錄〉（未出版），2002-2006年。
臺北市二二八紀念館所藏，「戰後臺中縣南投區署草屯鎮地方行政文書資料（暫稱）」（1946-1947年），
No.011856。
- 《臺灣日日新報》
《臺灣民報》
《臺灣新民報》
- ベネディクト・アンダーソン（著），白石隆、白石さや（訳）
1997 《想像の共同体：ナショナリズムの起源と流行》。東京：NTT出版。
- 田沢義鋪記念会（編）
1967 《田沢義鋪選集》。東京：田沢義鋪記念会。
- 石田浩
1985 〈台湾中部における漢人村落の展開過程とその社会構造：南投県草屯鎮加老里の洪同族の調査事例〉，收於氏著，《台湾漢人村落の社会経済構造》，頁91-140。大阪：関西大学出版部。
- 竹内洋
2005 《立身出世主義：近代日本のロマンと欲望》。京都：世界思想社。
- 弘谷多喜夫
1984 〈植民地教育と日本人教師〉，收於「講座日本教育史」編集委員会編，《講座日本教育史》，
第3卷，頁361-381。東京：第一法規出版。
- 吳文星
1992 《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臺北：正中書局。
- 吳萬成
1930 《昭和六年当用日記》。東京・大阪：株式會社積善館。
1936 《更生 昭和十二年日記 向上の跡》。京都：日本赤十字社京都支部。
- 町田則文
1899 〈會員に告ぐ〉，《校友會雜誌》1:1。
- 呂紹理
1998 《水螺響起：日據時期臺灣社會的生活作息》。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周婉窈
1989 《日據時代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臺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
- 岡本真希子
2004 〈殖民地統治下臺灣的政治經驗〉，收於若林正丈、吳密察主編，《跨界的臺灣史研究：與東亞史的交錯》，頁171-178。臺北：播種者文化有限公司。

- 2008 《殖民地官僚の政治史：朝鮮・台湾総督府と帝国日本》。東京：三元社。
- 林莊生
- 1992 《懷樹又懷人：我的父親莊垂勝、他的朋友及那個時代》。臺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
- 林燕飛（編）
- 1935 《新中州の展望》。臺中：締交通信社。
-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主編）
- 2000-2010 《灌園先生日記（一～十六）》。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
- 洪郁如
- 2001 《近代台湾女性史：日本の植民統治と「新女性」の誕生》。東京：勁草書房。
- 洪敏麟（總編輯）
- 1986 《草屯鎮誌》。南投：草屯鎮誌編纂委員會。
- 洪敏麟（口述）、林金田、謝嘉梁（訪問）、劉澤民（記錄）
- 2010 《文獻人生：洪敏麟先生訪問紀錄》。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 洪敏麟（總編輯）、許錫專等（編）
- 1994 《洪氏族譜》。南投：重修洪氏族譜編輯委員會。
- 洪銘水
- 2001 〈《少奇吟草》跨越世代的見證〉，收於葉榮鐘著，葉芸芸、陳昭瑛主編，《少奇吟草》，頁 39-72。
臺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 洪樵榕（口述）、歐素瑛、卓遵宏（訪問）、歐素瑛（記錄整理）
- 2001 《洪樵榕先生訪談錄》。臺北：國史館。
- 若林正丈
- 2001 《台湾抗日運動史研究》。東京：研文出版。
- 宮崎聖子
- 2008 《殖民地期台湾における青年団と地域の変容》。東京：御茶の水書房。
- 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著）、吳叡人（譯）
- 2010 《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草屯國民小學
- 1970 《創立七十週年紀念同學錄》。南投：草屯鎮草屯國民小學。
- 張家綸
- 2008 〈草屯社會發展與地方菁英（1751-1945）〉。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
- 張淑玲
- 2003 〈臺灣南投地區傳統詩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 張深切（著）、陳芳明等（編）
- 1998 《張深切全集》。臺北：文經出版社有限公司。
- 許世楷
- 1972 《日本統治下の台湾：抵抗と弾圧》。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 許佩賢
- 1994 〈塑造殖民地少國民：日據時期臺灣公學校教科書之分析〉。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暨研究所碩士論文。

- 2001 〈臺灣近代學校的誕生：日本時代初等教育體系的成立（1895-1911）〉。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暨研究所博士論文。
- 許錫專（編）
- 1998 《草屯地區開發史資料集》。南投：臺灣洪氏家廟、財團法人洪氏子女獎學基金會。
- 陳文松
- 2005 〈1920年代殖民地台灣における「青年」の争奪：台湾總督府文教局の設立と後藤文夫〉，《アジア地域文化研究》1: 17-37。
- 2007 〈洪元煌の抗日思想：ある「台湾青年」の活動と漢詩〉，《日本台湾学会報》9: 67-92。
- 2008 〈殖民地支配と「青年」：台湾總督府の「青年」教化政策と地域社会の変容〉。東京：東京大学総合文化研究科地域文化研究専攻博士論文。
- 2008 〈臺灣近代學閥形成之原型：以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同窗會為中心〉，收於若林正文、松永正義、薛元元主編，《跨越青年學者臺灣史研究論集》，頁 103-136。臺北：稻鄉出版社。
- 2009 〈從傳統士人到「近代青年」的文化交錯與轉換：「不倒翁」洪元煌與草屯碧山吟社〉，《臺灣古典文學研究集刊》1: 289-343。
- 2010 〈評介宮崎聖子著《殖民地期台灣における青年団と地域の変容》〉，《臺灣史研究》17(2): 243-252。
- 陳培豐
- 2008 〈日治時期臺灣漢文脈的漂游與想像：帝國漢文、殖民地漢文、中國白話文、臺灣話文〉，《臺灣史研究》15(4): 31-86。
- 陳明通
- 1995 《派系政治與臺灣政治變遷》。臺北：月旦出版社。
- 曾敏怡
- 1998 〈草屯地區清代漢人社會的建立與發展〉。臺中：東海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
- 黃美娥
- 2004 《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臺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
- 2008-2010 《黃旺成先生日記（一～七）》。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 黃富三、陳俐甫（編）
- 1991 《近現代臺灣口述歷史》。臺北：林本源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 楊永彬
- 2000 〈日本領臺初期日臺官紳詩文倡和〉，收於若林正文、吳密察編，《臺灣重層近代化論文集》，頁 105-181。臺北：播種者文化有限公司。
- 葉榮鐘
- 2000 《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臺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 2000 《臺灣人物群像》。臺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 臺北師範學校創立三十周年紀念祝賀會（編）
- 1926 《臺北師範學校卒業及修了者名簿》。臺北：臺北師範學校創立三十周年紀念祝賀會。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吳密察（解題）

1995 《臺灣社會運動史》。臺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

臺灣教育會（編）

1928 《臺灣教育》。臺北：臺灣教育會。

1995 《臺灣教育沿革誌》。臺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

臺灣新民報社調查部（編）

1934 《臺灣人士鑑》。臺北：臺灣新民報社。

臺灣總督府（編）

1916 《臺灣列紳傳》。臺北：臺灣總督府。

1926 《青年會其ノ他社會教化的団体調》。臺北：臺灣總督府內務局文教課。

1926 《全島青年団，処女會，家長會，主婦會調》。臺北：臺灣總督府文教局。

蔡培火（著）、張漢裕（主編）

2000 《蔡培火全集》。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

駒込武

1993 〈抗日運動における教育要求と総督府の教育政策：1920-1930年代台中州草屯庄の事例を中心に〉，收於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編，《日據時期臺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415-442。
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顏杏如

2009 〈植民地都市台北における日本人の生活文化：「空間」と「時間」における移植、変容〉。東京：東京大学総合文化研究科地域文化研究専攻博士論文。

2007 〈二つの正月：植民地台湾における時間の重層と交錯（1895-1930年）〉，《日本台湾学会報》9: 1-21。

Lo, Ming-cheng Miriam 駱明正

2002 *Doctors within Borders: Profession, Ethnicity, and Modernity in Colonial Taiwan*.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ilingual Elites in Colonial Taiwan: Cases of Three Members From the Hung Clan in Caotun Township

Wen-sung Chen

ABSTRACT

In the early days of Japanese rule,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on the one hand used force to suppress the local anti-Japanese militia, while on the other involved Taiwanese gentries in local administration. The education system was reformed and new public schools were established for the children of local gentries with the aim to cultivate 'bilingual elites' equipped with modern ideas who could contribute to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In the case of Caotun Township, these educated elites well versed in both Chinese and Japanese had played important roles in both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and the local regional society during the Japanese rule for almost half a century.

This paper studies the anti-colonial movement led by Hung Yuan-huang at Caotun, focusing in particular on influential figures of his clan who sided with Hung and supported his cause. Like Hung Yuan-huan himself, many of his kinsmen in Caotun received both traditional Chinese learning and modern colonial education. After graduating from the Japanese Language School, the highest educational institute of the time, many of them served as teachers at local elementary schools. Tracing the teaching career of three Taiwanese young teachers, Hung Qing-jiang, Hung Shen-keng and Wu Wan-cheng, all from the Hung clan, this paper portrays the different strategies they adopted when caught up in their conflicting roles as agents implementing colonial policies and as local elites promoting social autonomy.

Keywords: Bilingual Elite, Yuan-huang Hung, Qing-jiang Hung, Shen-keng Hung, Wan-cheng Wu, Caotun Township, Japanese Language School